臺灣文獻 別冊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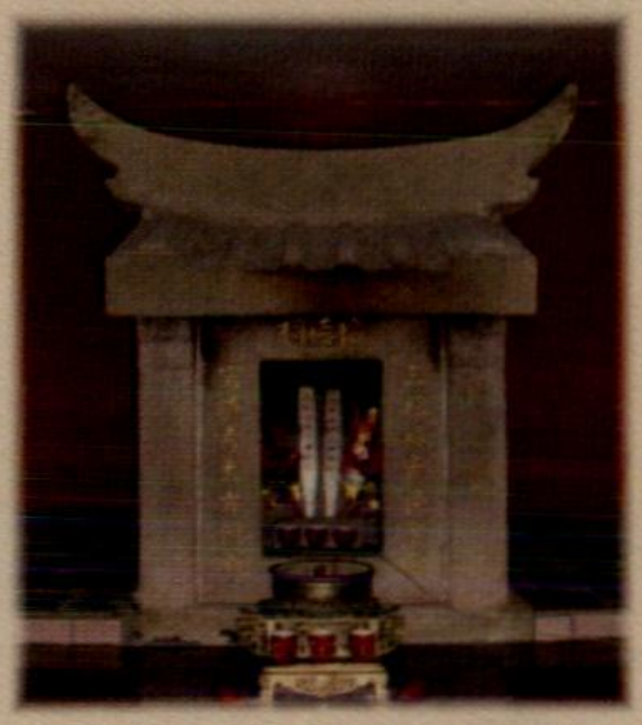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100年3月31日

臺灣文獻 別冊 36 目錄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苗栗公館客家聚落伯公廟踏尋

文／圖 羅永昌 2

談甲午戰役沈傳間諜檔案

文／陳文添 11

西螺北管子弟團錦城齋

文／圖 李孟勳 24

列入日本土木遺產的國定古蹟「臺南水道」

文／圖 陳正美 36

從「三更燈火五更雞」到「秒殺」：臺灣時間的故事

文／圖 李西勳 50

埔里辛德勒名單：謝添發家族

文／圖 李展平 58

臺灣鸞門出版異數：《海嶠鸞音》

文／圖 林文龍 69

垃圾？瑰寶？搶救日治時期警察民政檔案

文／圖 陳遵旭 75

苗栗公館客家聚落伯公廟踏尋

文／圖 羅永昌

一、前言

公館為苗栗縣所轄18鄉鎮市之一，住民大多屬於客家籍，是一處以客家人為聚居地的客家聚落，地方信仰除了一般的民間宗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之外，主要以「伯公」信仰最為普遍。根據民國81年公館鄉公所所作的統計，公館全境計有264座大小不一、形貌不同的土地公廟建築，其中即包含了諸多傳統古樸的伯公廟。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傳統客家伯公廟，因疏於保存而相繼遭到拆除改建的命運，能完整保存至今者，實已為數不多矣。依此，筆者試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運用數位影像的拍攝，為地方文化資產留下紀錄。

二、伯公信仰的起源

福德正神，一般通稱「土地公」、「福神」、「伯公」、「大伯爺」、「大伯公」、「后土」、「福德

爺」，或簡稱「土地」者。其中以「福德正神」、「福德爺」的稱呼較為尊崇[1]，並通稱土地祠為「福德廟」或「福德祠」，屬於自然地祇的崇拜，為臺灣地區普遍信仰的鄉土神祇。在公館客家庄，通稱福德正神為「伯公」，稱其建築為「伯公廟」或「伯公下」。

臺灣的土地公除了具有農業神的形象以外，可依據神職的不同，將民間的土地公信仰區分成村落守護神、家宅守護神、農業神、財神、墳墓守護神、水源守護神、山神、職業守護神、建築業守護神、戶政神、開路神、社會雜務神等12種屬性[2]。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農事及牲畜的豢養為聚落村民重要的經濟來源，正因如此，農家子民基於“靠天吃飯”的人文思維，對於守護土地、保護農業的「伯公」，有著一份濃厚的感情。伯公不僅成為村民的守護神，無形之中，儼然也成了護佑牲畜平安長成的保護神。村民透過平時與年節虔敬的祭拜行為，一方面祈求獲得土地公的庇佑福蔭，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在農事上能夠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福德正神，在臺灣民間信仰當中，可說是信眾最多的神祇，無論士、農、工、商，

1 參見：鍾華操著，《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華民國77年4月3版，頁188。吳兆玉、彭宏源主編，《尋找先民的守護神》，苗栗：苗栗縣文化局，95年9月，頁1。

2 王健旺著，《臺灣的土地公》，臺北縣：遠足文化，民國92年出版，頁32－39。

各界都供奉祭拜，每月初1、15，或初2、16，農事、工程起工及竣工、歲時節令，信眾備鮮花素果、牲醴祭品、香燭紙錢，進行祭祀。

「田頭田尾土地公」、「庄頭庄尾土地公」，這兩句眾人耳熟能詳的臺灣俗諺，道出了臺灣民間土地公信仰的普及與興盛。關於土地公廟的選址和命名，往往和先民的拓荒卜居有著緊密的關係，其分布地點除了田頭田尾、庄頭庄尾（里社）、水頭水尾以外，亦分布在埤塘邊、水圳邊、山坑、林埔等處所。而伯公廟及其伯公的命名，以自然地景（如植物、埤塘、溪流）和庄頭聚落地名命名較為多見。前者猶如「樟樹」伯公、「榕樹」伯公、「苦楝樹」伯公、「茄苳」伯公、「乾埤」伯公、「水頭」伯公、「水口」伯公等。後者如「竹圍」伯公、「茶館前」伯公、「大坑口」伯公、「茶園坪」伯公。此外，也有少數以方位命名者，如「西片」伯公、「中央」伯公。（圖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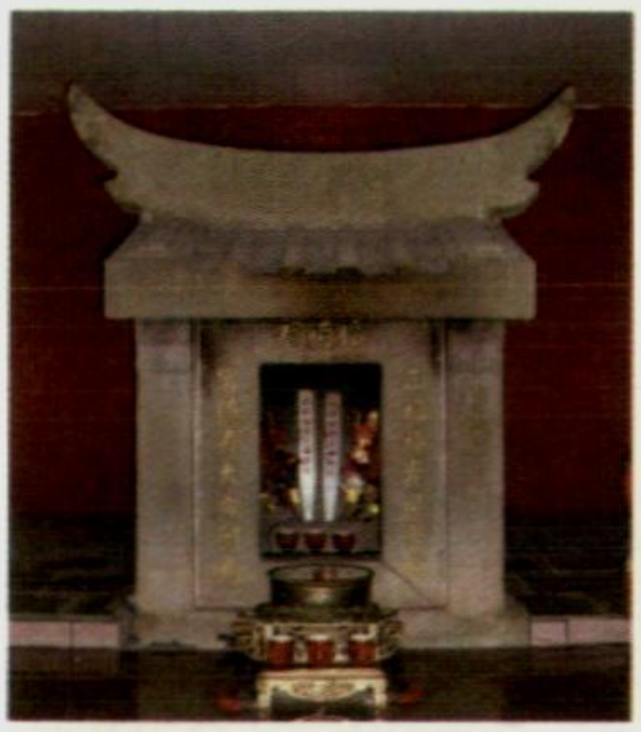


圖1 在公館客家庄，蓋以「伯公」稱呼福德正神(福德村坑尾伯公)。

圖2 以自然地景命名的「樟樹伯公」(福德村北寮)。

圖3 以庄頭聚落的地名命名的「坑口伯公」(福德村)。

三、公館地區伯公廟概述

公館各地最初、最原始的伯公形貌多以「原石」或「三粒石」(石棚)的方式呈現。隨著聚落型態的成熟，以及經濟條件的改善，土地公廟逐漸由簡陋的「三粒石」發展成伯公廟型態。民國60年代以後，祠廟式土地公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進而取代傳統的伯公廟。加以近年來各地伯公廟拆除重建者眾，導致傳統古樸的客家伯公廟日趨消失，完整保存者，全境數量不到40座[3]，相當珍貴。

伯公廟，為一獨立成形的實體，具體而微，其由八塊厚實的石板鑿砌而成，並經人為的加工與雕鑿，脫

3 依筆者實際發現者計有：館中村1座、中義村2座、大坑村5座、福基村1座、福星村3座、福德村6座、五谷村3座、仁安村2座、石墻村1座、鶴山村1座、南河村5座、北河村7座，合計37座。

離了石板堆砌的原始味道，形貌更顯精緻典雅。公館地區的伯公廟，各座形體大小不一，高度皆不及人高，平均高度一般在120－130公分上下，小則70－100公分左右。

公館地區的伯公廟，屋脊形貌大致分成馬背型屋脊及燕尾型2種，且多為兩坡落水屋頂。部分燕尾型屋脊伯公廟，屋脊正上方處，可以發現象徵「福祿」的葫蘆石雕裝飾，馬背型屋脊伯公廟則無此裝飾。而且多數伯公廟的屋脊、屋頂、立面都雕有精美的紋飾，常見的紋飾有花卉、瓦當、滴水、花瓶、祥雲、鳳凰、麒麟等圖樣。廟立面皆刻有「福德祠」3字橫批與對聯，至於鐫刻落款時間和落款者，並不多見。（圖4、5）

圖4 燕尾型屋脊形貌的伯公廟（大坑村）。

圖5 馬背型屋脊形貌的伯公廟（大坑村）。

若以「伯公石牌」進行分類，大致可分為獨立式伯公石牌（鐫刻「福德正神香位」字樣）、嵌於廟體後壁的伯公石牌，以及未刻製石牌而雕鑿伯公像嵌於廟體後壁者3類，3種類型當中，以獨立式伯公石牌佔多數。又

一座保存完整的伯公廟，除了伯公石牌或伯公石雕像以外，尚可見到石雕香爐、薦台、燭台等祭器文物。（圖6－8）

圖6 獨立式「伯公石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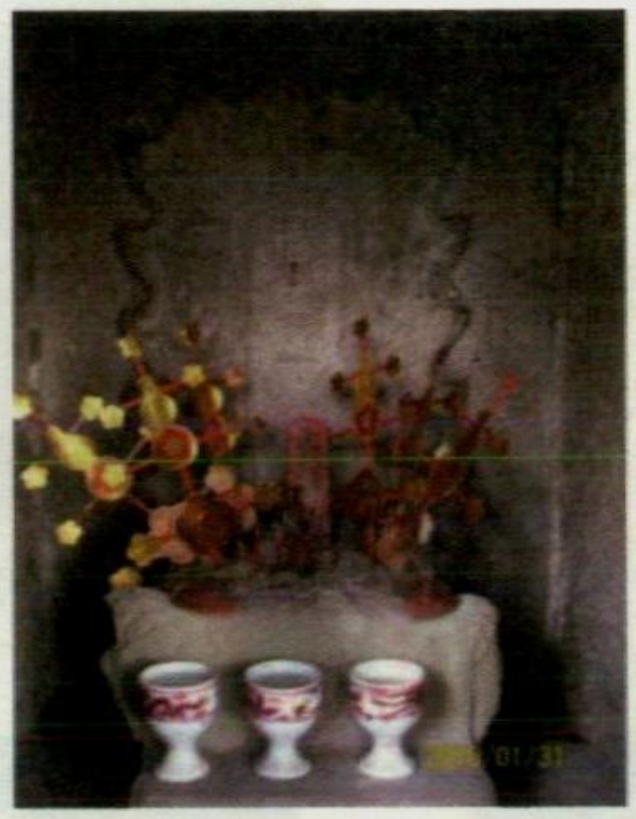


圖7 嵌於廟體後壁的「伯公石牌」

圖8 伯公石雕像

公館地區的伯公廟，在空間景觀的呈現上具有兩項共同的特徵，即「化胎」結構與「伯公樹」的栽植。「化胎」，又稱花胎、花台，位於正身後面，呈半圓形隆起土丘狀，形如座椅的靠背，被認為是聚氣納福的地方，象徵著安穩、化育的意思，具有福蔭的作用。在客家建築當中，「化胎」不但是一項相當具代表性的建築元素，同時也象徵客家建築風水觀念的表現[4]。而「伯公樹」即為古人所謂的「社樹」象徵，一般都栽植於伯公

4 李乾朗著，《臺灣建築閱覽》，臺北市：玉山社，1996年，頁68。吳奕德，〈從土地公信仰看臺灣的族群文化現象－漫談客家伯公建築〉，收入於2005年《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宗教與亞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頁7。

廟正後方「化胎」處，或是栽植於伯公廟廟旁[5]。常見的伯公樹大多以榕樹、樟樹為主，如斯伯公樹有些為當地原生老樹，有些則為後人所植。伯公樹的栽植，是以樹木的繁茂昌盛來象徵土地生生不息的生機[6]。（圖9－11）

圖9 伯公廟後的「化胎」結構(福星村)。

圖10 伯公廟與「伯公樹」(中義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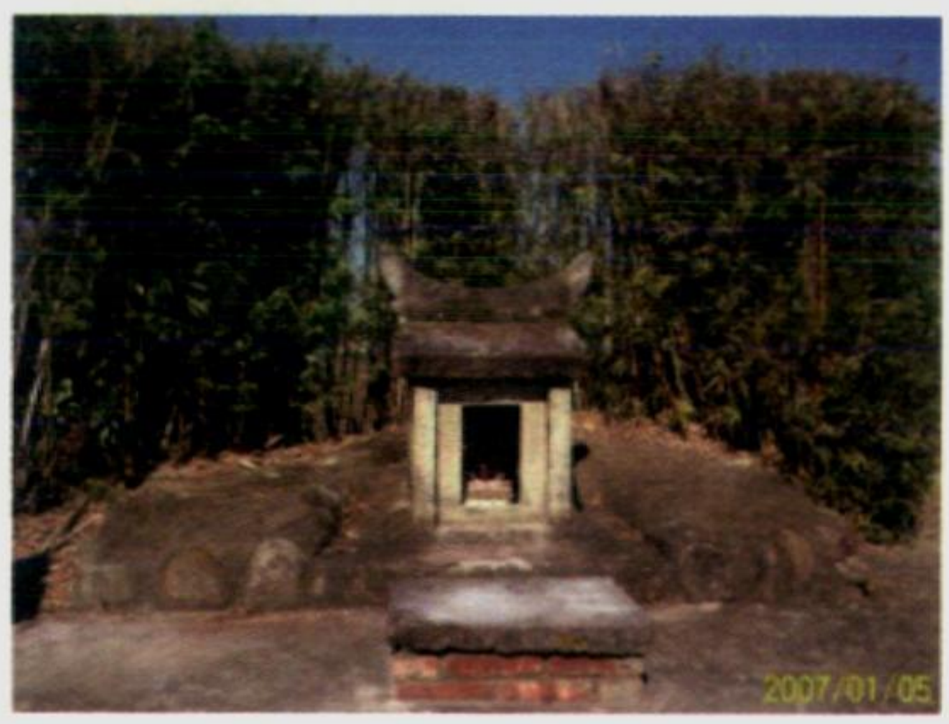


圖11 伯公廟化胎外緣所栽植的「雞臘竹」(石墻村)。

公館地區的伯公廟，除了主祀神「伯公」香位以外，亦配祀「天神爺」、「好兄弟」、「金銀庫神」香位。「天神爺」香位設於伯公廟的正前方，而「好兄

5 調查發現，也有在伯公廟化胎外緣栽植「雞臘竹」者，性質等同於伯公樹的作用，實例可見石墻村15鄰伯公廟。

6 劉懿瑾，〈客家聚落「中心－四方」的神聖空間性－以苗栗公館石圍墻庄為例〉，《環境與藝術學刊》第七期，2009年，頁140。

弟」、「金銀庫神」香位則分設於「天神爺」香位兩側，位置並無一定的限制。

上述香位的設置，會依不同區域而有所差異，有的伯公廟3者皆俱，有的只設置「天神爺」與「好兄弟」香位或「天神爺」與「金銀庫神」香位，少部份伯公廟僅設置單一「天神爺」或「好兄弟」香位。除上述祭祀對象以外，基本上不會出現其他的祭祀對象。（圖12－13）

圖12　伯公廟正前方設有「天神爺」香爐，左側為石雕金庫(大坑村)。

圖13　伯公廟與正前方的「天神爺」香爐(中義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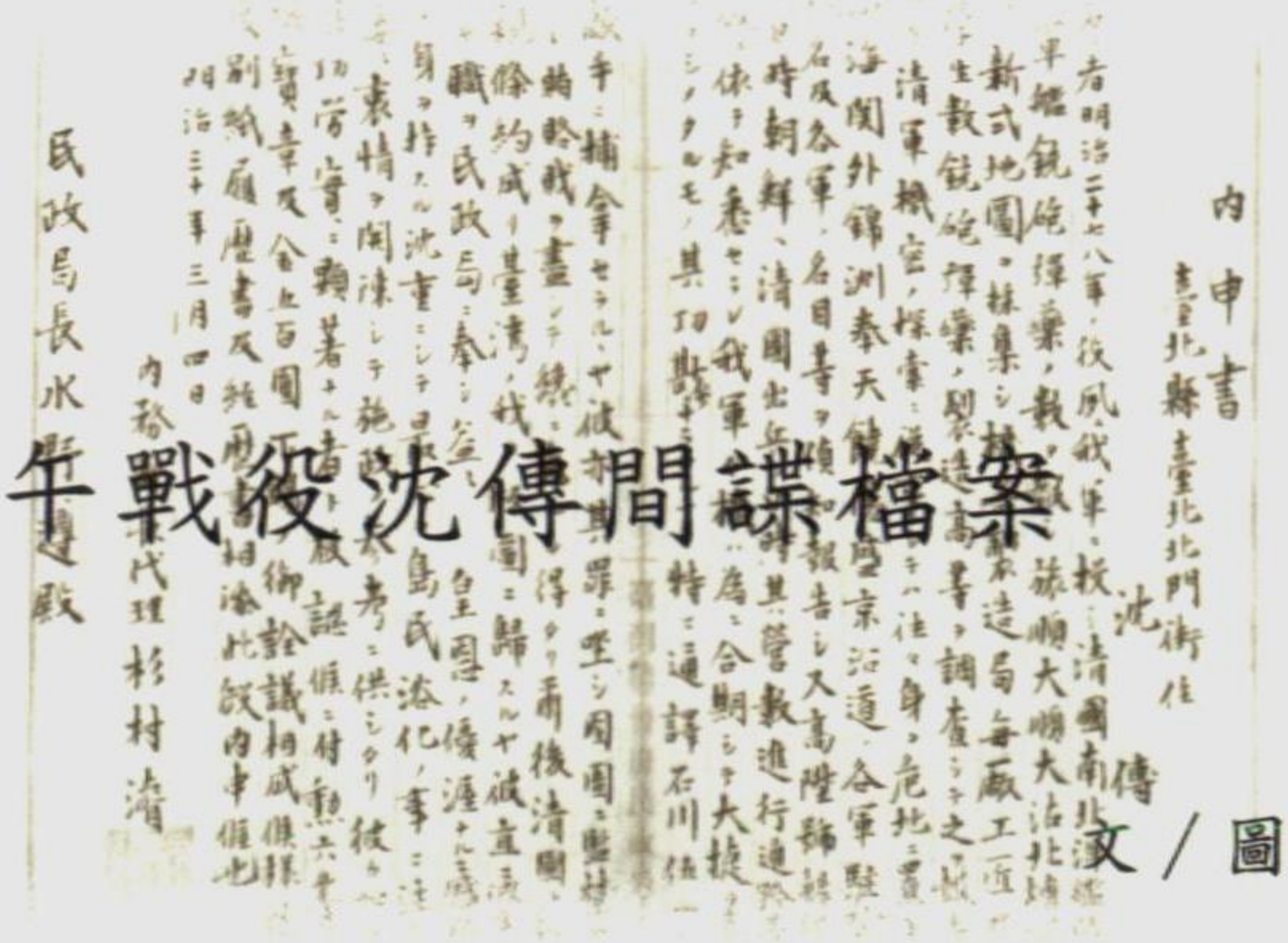
四、小結

綜合上述，公館地區的伯公廟，在空間景觀的呈現上、祭祀行為的表現上都具有高度相似的文化元素。透過比較，更足以判別閩、客族群土地公廟建築的差異性。伯公的信仰與崇拜是公館客家庄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而傳統古樸的伯公廟同為地方上重要的文化資產，每一座伯公廟皆有其歷史內涵與文化脈絡，乘載著聚落

村民共同的歷史回憶。另一方面，藉由伯公信仰，連結了人、聚落、歷史、文化、信仰等各個層面，結合了有形的文化實體以及無形的人文精神。正因如此，伯公廟的保存，實有其珍貴性與歷史性。

（羅永昌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研究所碩士）

談甲午戰役沈傳間諜檔案


內申書
臺北縣臺北北門街住 沈傳
清國南北洋
新式地圖ノ採集シ
清軍機密ノ探偵ニ
海關外錦洲奉天鐵
時朝鮮ヘ清國出兵
我軍ノ
戦爭ニ捕虜ト
民政局ニ奉シ
袁世凱ノ陶漢ニシテ
島民添化ノ事ニ
内務
民政局長水野遵殿
代理 杉村濬

文／圖 陳文添

一、諜案資料 隱身檔案

一談到間諜，首先浮現腦海的是為取得所需情報，不管合不合法，無所不用其極，運用各種活動以取得情報的人員。個人的想法也許並不正確，我對間諜的印象是神秘、不可見人，免不了是陰暗、鬼祟的模樣。會引起重視，通常是在諜報行動失敗才被公諸於世。而成功的間諜活動，也許只有極少數相關人士知悉經過，若未留下檔案則有可能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之中了。但不管成功與否，檔案還是最有可能留下間諜活動紀錄的資料，所以歷年來曾閱覽諸多總督府檔案中的領事關係文件、法院判決書、行政報告等，希望在其中發現日本共產黨、間諜關係檔案。卻在不經意間於人事任用文件中，發現1位間諜人物—沈傳。沈傳原姓汪，姑隱其名，為來臺灣才更改姓名。他是甲午戰爭期間清朝的軍官，竟

然擔任日本間諜長達12年之久。本案之轉折有其特殊之處，故特撰此文加以介紹。

二、沈傳叛清 效忠日本

依據《臺灣總督府檔案》資料顯示[1]，沈傳是在明治28（1895）年12月28日，由內務部長牧朴真報請任命在民政局警保課任職，月薪支給50圓，名目上是屬正式職員的雇員。但後來人事課卻將沈傳改任命為非正式的聘任人員（事務囑託）。[2]相關文件並附有大本營參謀總長彰仁親王致樺山總督，以及日本駐清公使館所屬陸軍中佐神尾光臣及海軍大佐井上良智上陳大本營參謀總長彰仁親王函各一件，在在顯示沈傳人事案件並不單純。因之乃再查閱總督府檔案及日本數年前開放的戰前官方檔案資料，其中竟然還有沈傳相關的紀錄，意外的有了更多的發現。

前文提及之大本營是日本戰前直屬天皇的最高統帥機構，最初設立於1894年6月5日，是為因應日清兩國戰爭勢不可免而成立。此時適用的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海軍軍令系統的軍令部長仍須受陸軍軍令系統參謀總長的節制，所以參謀總長是唯一的幕僚長。這一段期間進

1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0卷第1件〈元清國人沈傳民政局事務囑託ノ件〉。

2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50卷第1件〈元清國人沈傳民政局事務囑託ノ件〉。

入大本營的海軍軍令部長，就是後來的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於陸軍的參謀總長是彰仁親王，彰仁親王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同父異母的兄長，繼1895年1月病逝的熾仁親王擔任此一職務。但這戰時機構則在隔年的1896年4月1日解散，陸海軍才於此日回歸平常編制。

至於從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開放閱覽的資料顯示，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領導野戰部隊的日本第一軍司令官野津道貫及第二軍司令官大山巖在戰爭結束帶兵回國後，曾聯名上書大本營參謀總長彰仁親王，提及在甲午戰爭期間有清國國民100餘人為這兩個軍團工作。在戰爭結束且日本也交還遼東半島之後，這些人之中有人害怕會被清國處刑及沒收財產，會向日本方面請求保護或者申請歸化。所以希望大本營方面能夠下令佔領地總督，若有替日軍盡力者提出歸化、移住之申請時，希望能對這些曾對日軍盡力人員給予保護及允許歸化。[3]

3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如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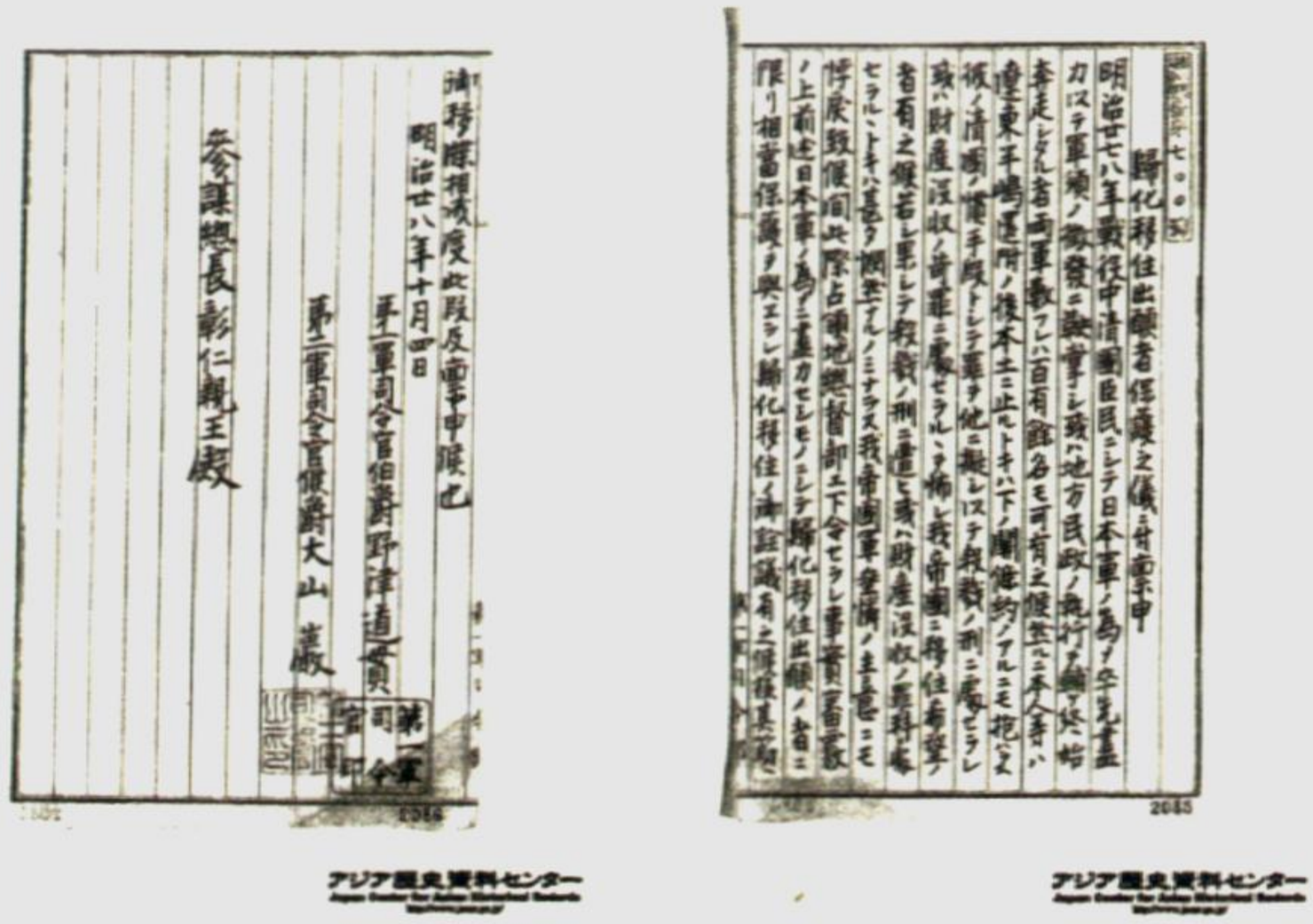


圖1 甲午戰爭結束，日本第一及第二軍司令官聯名上文大本營參謀總長，表示為這兩軍團盡力的清朝治下人民有一百餘人，若這些人中有申請歸化、移民請給與許可。

時至今日，對於當時清國人曾向日本申請保護或歸化的確實人數已無法確考，但是會有高達100多位清國人民會甘心為日本鷹犬，為日本軍隊蒐集情報，這一點確有值得警戒之處。

甲午戰爭結束後，清日兩國已簽署和約並且雙方再度互設公使館。當時北京日本公使館內的日本陸軍及海軍武官，於確認先前曾為日本工作或被處死或下獄人員的遺族或其本人下落後，在1895年9月10日同樣報告大本營參謀總長彰仁親王，請求給予遺族或本人適當的撫恤或援助。

據相關陳報內容顯示，北洋軍械所書吏劉樹棻曾向

日本報告北洋艦隊及砲臺的裝備，以及清軍出兵朝鮮到開戰這段期間的重要文件、秘密事項，並且在開戰後讓1個日本間諜潛伏在家中，後來他們兩人在1894年8月4日被捕，且於同月21日被處死。又有1個名為戴士元的外國語教師，因養子在盛字軍擔任哨官（連長），因而常往返養子駐軍地探詢盛字軍的情報，他不但報知日方盛字軍的狀況，也介紹海軍營務處書吏于邦起給日本海軍大尉瀧川具和認識，後來在1894年9月10日被捕，於1895年1月22日處死。2位武官因之報請給劉樹棻遺族2,000銀圓及戴士元遺族1,500銀圓，另有洩漏機密情節較輕微者姑與省略。[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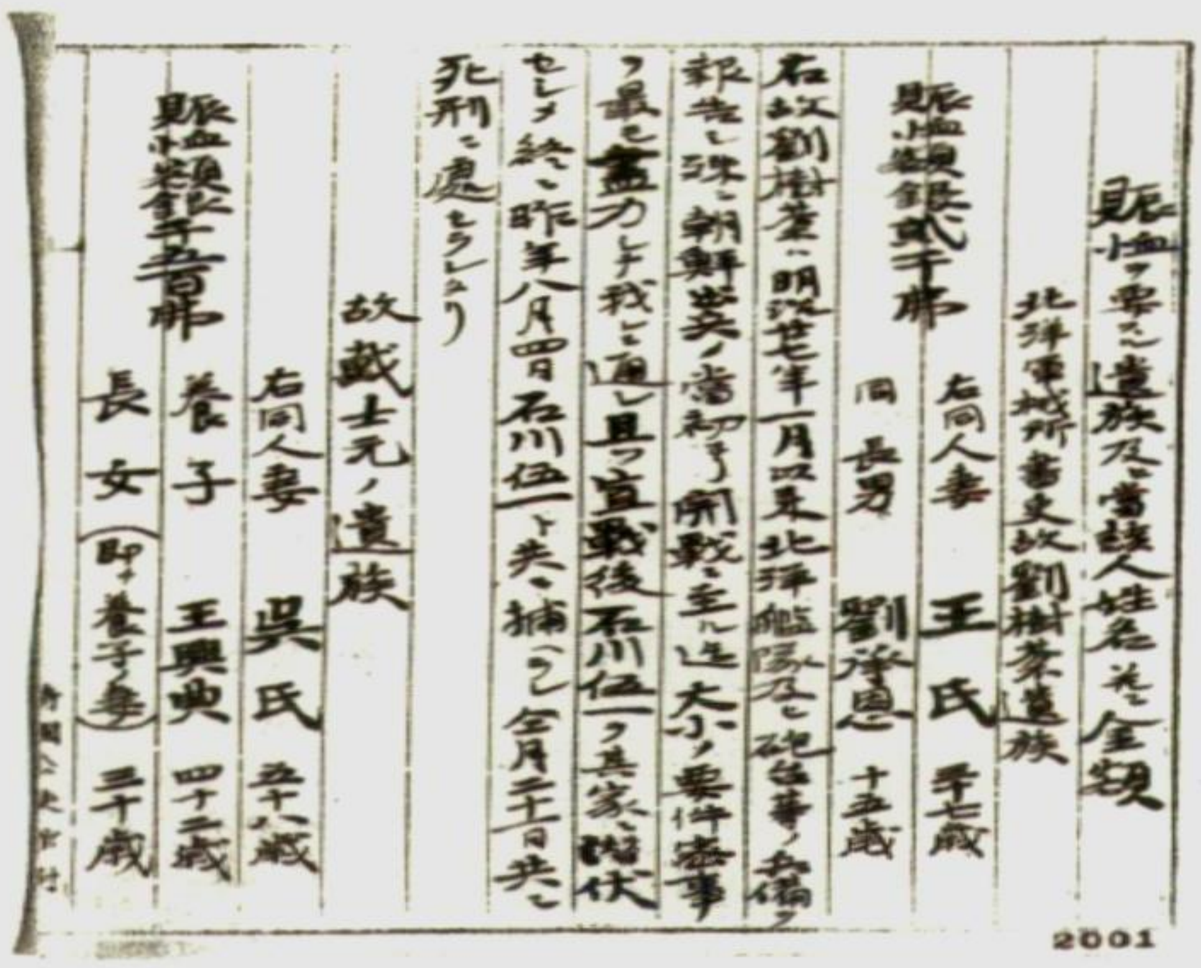

賑恤ノ事ニ付遺族及當該人姓名並金額
北洋軍艦所書吏故劉樹棻遺族
賑恤銀貳千弗　右同人妻　王氏　年七歳
同　長男　劉榮恩　十五歳
右故劉樹棻ハ明治廿七年一月以来北洋艦隊及砲臺等ノ兵備ノ報告ヲ探ル朝鮮安矣ノ當初ヨリ開戰ニ至ル迄大小ノ要件密事ヲ最モ盡力シテ我ニ通シ且ツ宣戰後石川伍一ノ其家ニ潛伏セシメ終ニ昨年八月四日石川伍一ト共ニ捕ヘラレ全月二十日共ニ死刑ニ處セラレタリ
故戴士元ノ遺族
右同人妻　吳氏　五十八歳
賑恤銀壹千弗　養子　王興典　四十二歳
長女（即チ養子ノ妻）　三十歳
2001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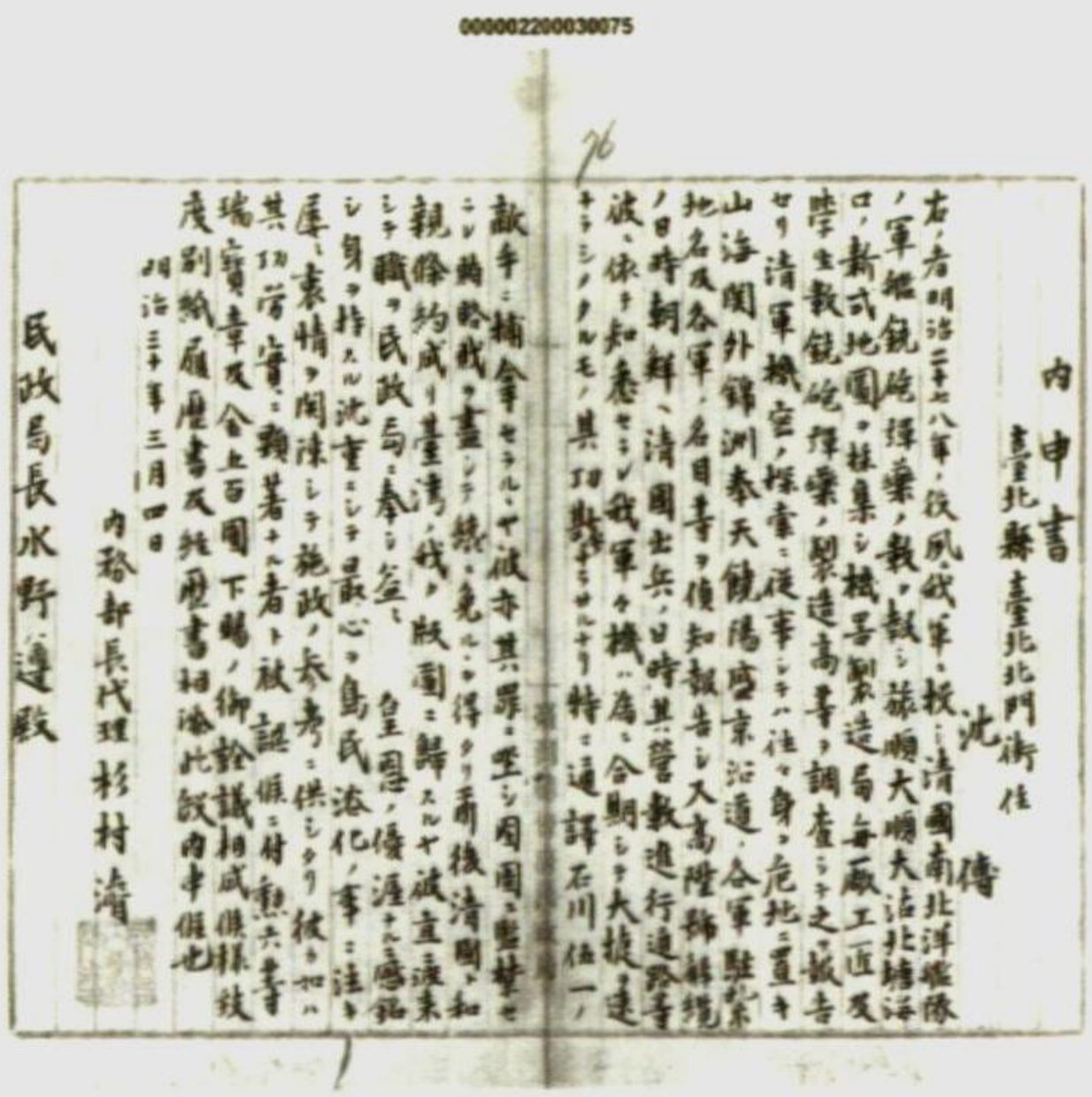
圖2　兩位為日本間諜而遭處死之清國人紀錄（部分）。

4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部分內容如圖2。

至於申請來臺灣的沈傳，是在申請來臺時才改名換姓，他是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為候補縣主簿。1881年時就在天津北洋護衛親軍營擔任砲隊排長（清廷稱為哨長）。在1884年清廷設立北洋武備學堂時，被拔擢為第一期學生，畢業後仍然擔任原職。雖擔任武職，但他原是文官出身人員，略有文筆之才。但很遺憾的，却從1883年起就成為日本派來清廷探聽情報陸海軍武官的爪牙，盡力為日本蒐集各種重要情派。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具體寫出他向日方報告清廷南北洋艦隊軍艦的槍砲數量，蒐集旅順大順以及大沽北塘海口之新式地圖，也調查機器製造局每一工廠工匠及學生數目、槍砲彈藥製造量等，一一告知日方武官。同時他也偵查後通報日方山海關關外錦州、奉天、饒陽、盛京沿途各軍隊駐防地及軍隊名稱。不只如此，日清兩國正式宣戰前發生之高陞號事件，便是他將這艘掛英國旗輪船出航日期、時間，以及清廷出兵朝鮮的日期、時間、營數、行進路線都告知日方，讓日方事先掌握先機，以致日方得以取得重大勝利。沈傳提供上述情報是總督府代理內務部長杉村濬，為他申請敘勳並發給獎金時寫的申請敘勳理由。[5]之前劉樹棻因為東窗事發被處死，而沈傳也被

5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220冊第3件〈黃舟外1名〔沈傳〕敘勳ノ儀具申ノ件〉。

查出是日本間諜而被關入監獄。其財產被捕吏、獄卒索求奪去，妻子陷於飢餓窘境，故舊親族也因懼遭連累而不敢親近。一直到後來日清恢復邦交，才因日本駐清公使林董之請求而被釋放。之後，應該是沈傳向公使館陸軍中佐神尾光臣提出想到臺灣的要求，才由神尾光臣及海軍大佐井上良智兩位陸海軍武官函請彰仁親王辦理。如此乃由彰仁親王通知樺山總督，此外，神尾光臣中佐也交給沈傳一封給總督府參謀長大島久直的介紹信，所以，沈傳終於在1896年被任命為總督府非正式的聘任人員。



000002200030075

76

内申書

臺北縣臺北北門街住

沈傳

右ノ者明治二十八年、役夙武軍ニ抜ミ清國南北洋艦隊ノ軍艦銃砲彈藥ノ數ヲ報シ旅順大連大沽北塘海口ノ新式地圖ヲ蒐集シ機器製造局每廠工匠及學生數銃砲彈藥ノ製造高等ヲ調査シテ之ヲ報告セリ清軍機密ノ探索ニ從事シテハ往々身ヲ危地ニ置キ山海關外錦州奉天饒陽鹿京沿道、各軍駐紮地名及各軍ノ名目等ヲ復知報告シ又高陞號綏遠ノ日時朝鮮ヘ清國出兵ノ日時其營數進行道路等彼ヘ依ヲ知悉セシメ我軍ヲ機ニ應シ合期シテ大捷ヲ達キタシノクルモノ其功數ヲ以テ特ニ通譯石川伍一ノ

歇手ニ補金ヲセラルヘキ彼本其罪ヲ坐シ囚獄ニ繫禁セラレ爾來ヲ盡シテ繼ヲ免ルヲ得タリ爾後清國ヲ和親條約成リ臺灣ヲ我ノ版圖ニ歸スルヤ彼直ニ來朝シテ職ヲ民政局ニ奉シ益々皇恩ノ優渥ヲ感銘シ身ヲ持スル沈重ニシテ最心ヲ島民涵化ノ事ニ注キ屢ヘ表情ヲ陶淑シテ施政ノ參考ニ供シタリ彼ヲ如ハ其功勞實ニ賞ニ勳著ヲ者ト被認候ニ付勲六等瑞寶章及金五百圓下賜ノ御詮議相成候様致度別紙履歴書及推薦書相添此段申進也

明治三十年三月四日

内務部長代理 杉村濬

民政局長水野遵殿

圖3 外交官出身的代理內務部長杉村濬報請給沈傳敘勳及發給獎金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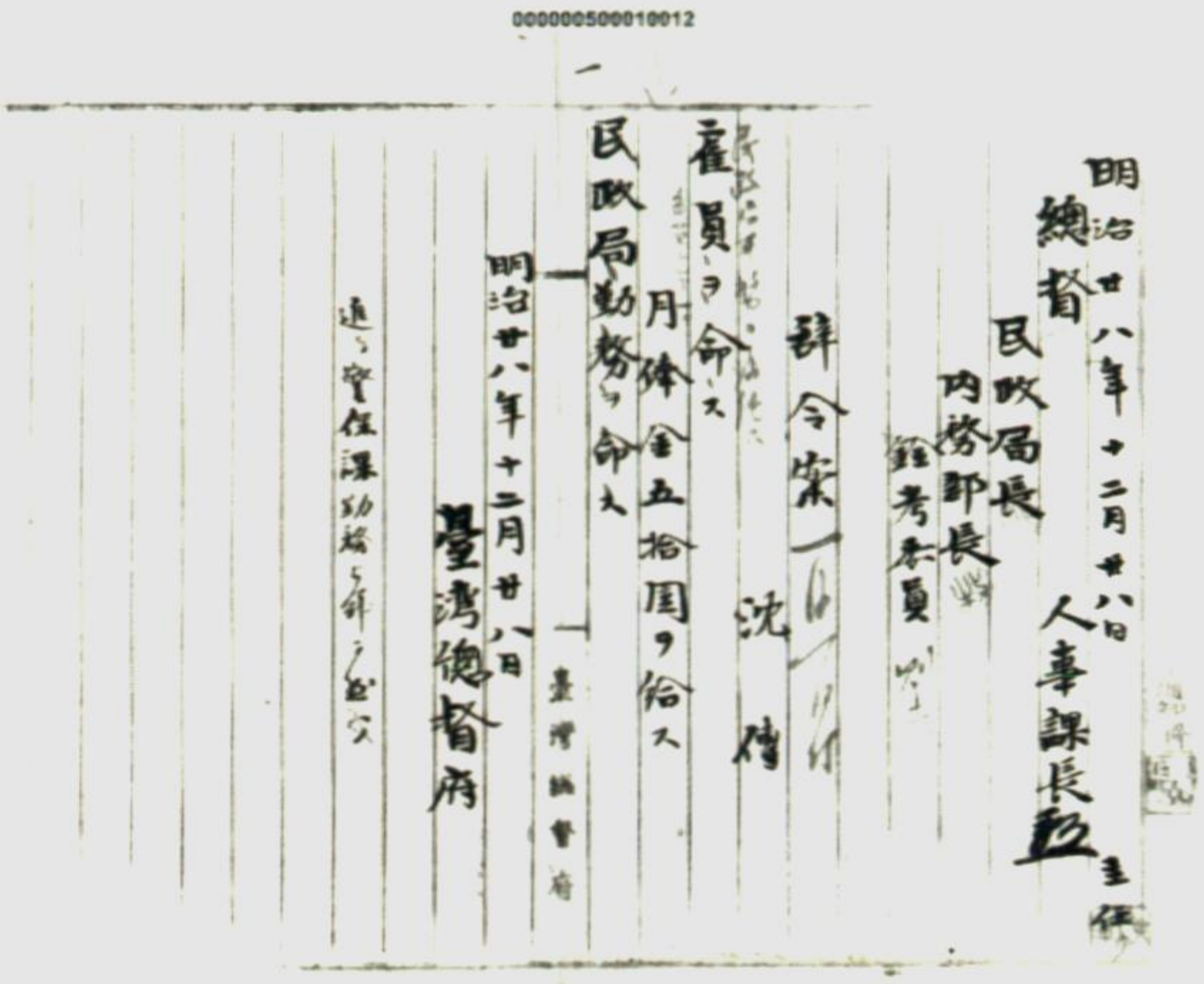


圖4-1 任命沈傳的人事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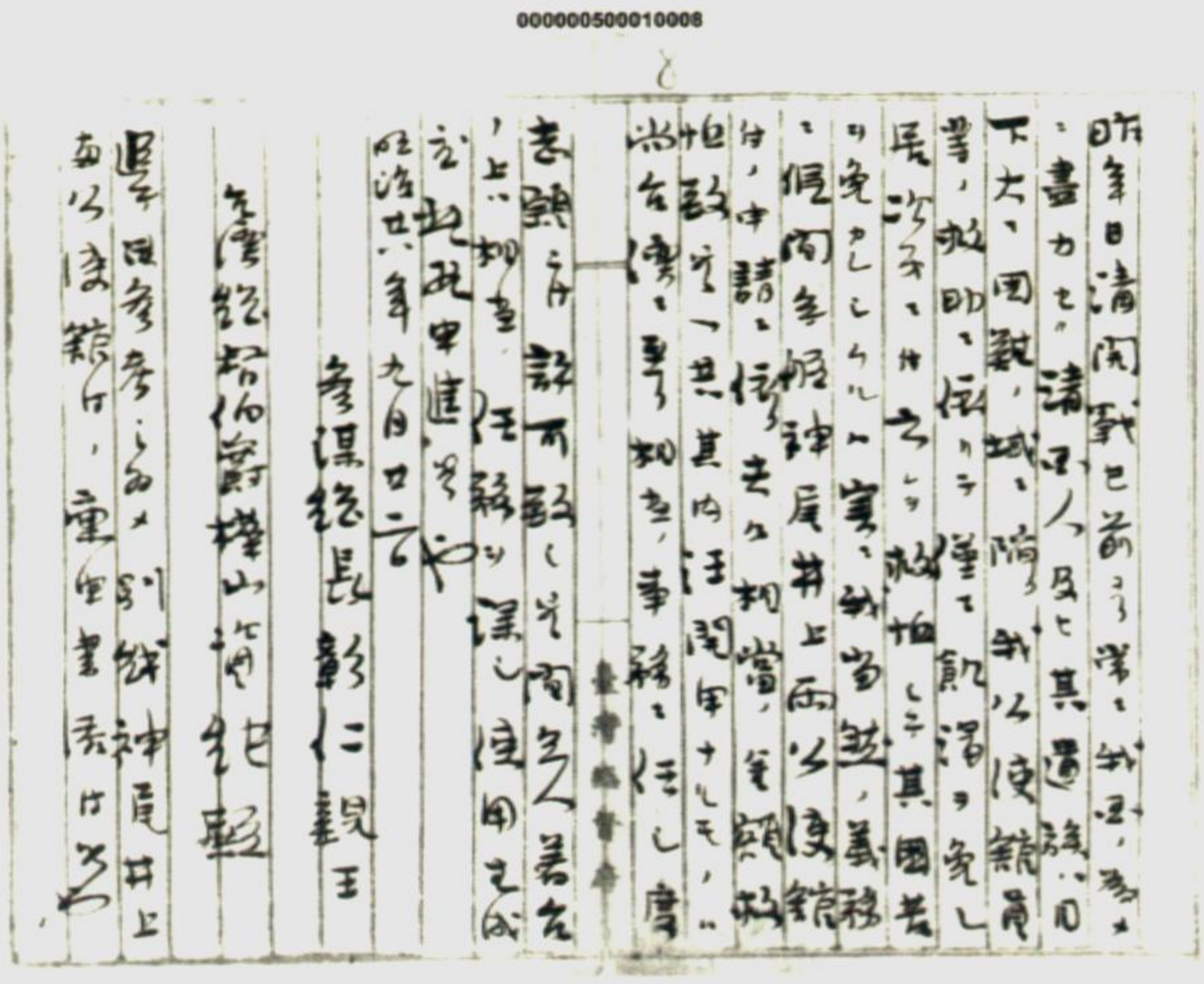


圖4-2 參謀總長彰仁親王報請樺山資紀總督任用函。

三、狡兔已死 走狗未烹

沈傳進入總督府以後，一直都在主管治安、警察、衛生方面的警保課任職，期間乃木希典擔任臺灣總督之時，內務部曾報請民政局辦理給予沈傳敘勳、佩戴紳章的殊榮。但是兒玉源太郎總督蒞任不久，情況立即有了轉變。總督府內原考量準備將沈傳以及馬鸞聲[6]撥給縣治課。代理課長是和新到任的民政局長後藤新平淵源深厚的阿川光裕，他上書表示：「馬鸞聲雖屬知識份子但罹有精神病且不熟悉日語，而沈傳文字能力仍有不足亦不通曉臺灣話，兩人並不適合留在縣治課。雖是如此，國家有扶養這兩個人的義務，絕不能棄置不顧，可以考慮給予一筆金錢以和官方斷絕關係，之後甚至送返故國也無不可。」[7]

因之，兒玉總督在1898年5月21日發文陸軍大臣表示，就沈傳投誠這一層次而言，應由整個國家來替他考量才是，不宜由一個機關來處理；而且臺灣總督府就財政狀況而言，也實在無力負擔沈傳薪資，所以請陸軍省審酌處理。陸軍省收到之後，在同年6月17日擬訂報內閣會議文件，承認沈傳功勞，給與6,000圓巨款，獲得內

6 馬鸞聲，原東北地方海城人曾協助第三師團的秀才，也同樣擔任間諜。

7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329冊第34件〈清國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沈傳金員給與ノ上解職ニ關スル件〉。

閣會議通過，陸軍大臣副官乃發文送府內陸軍單位再轉請總督府民政部轉交，沈傳就此離開了總督府。但之後也並未和官方完全脫離關係，仍擔任臺北縣立仁濟院評議員之職，也曾在舉辦饗老宴等特殊情況時，被邀請擔任委員之類的閒差。而一同上報的馬鸞聲，中央並未做處理，可能是中央認為馬鸞聲在離開遼東半島時，日本方面已經給予1萬日圓之故。[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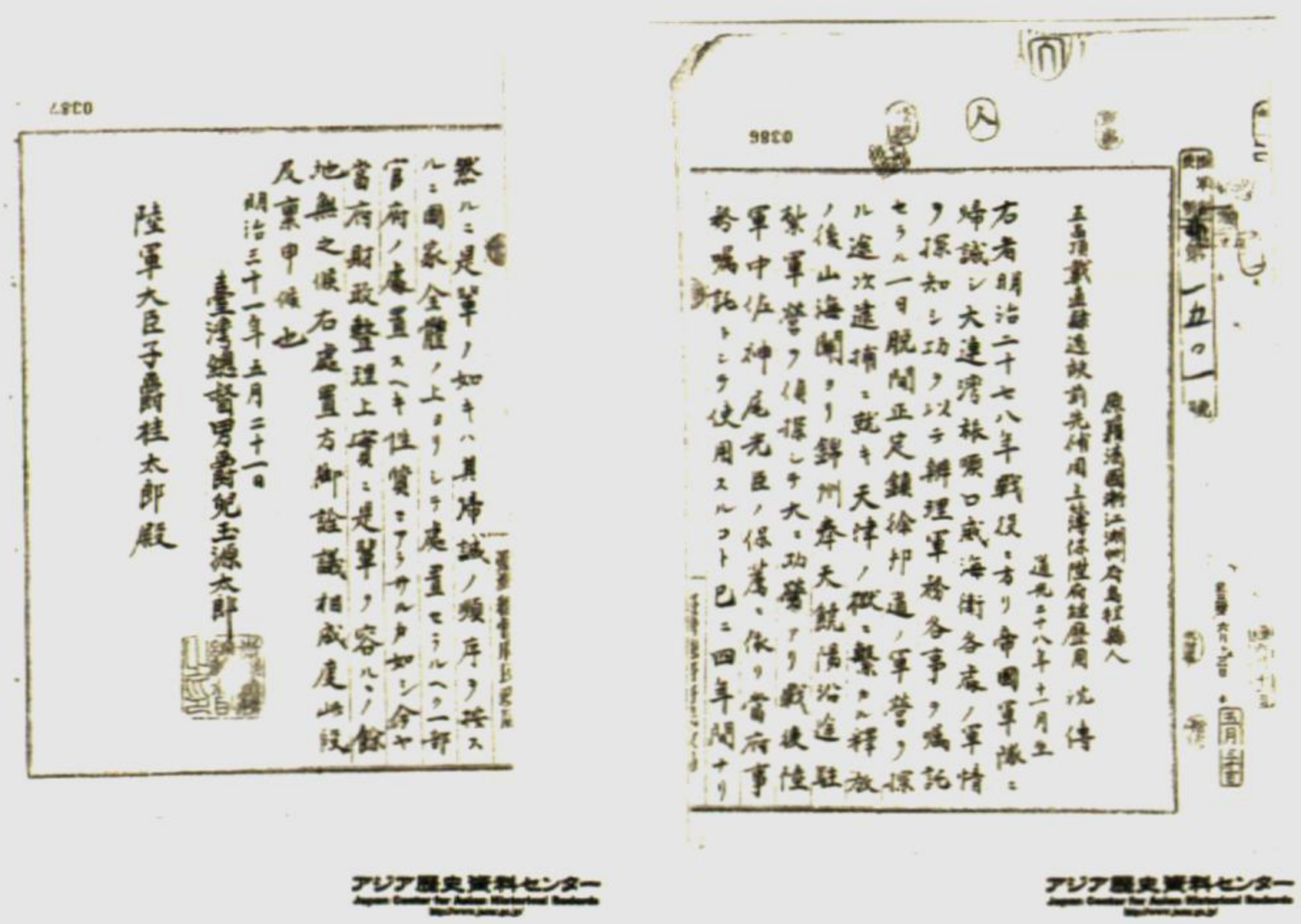


圖5-1　1898年兒玉源太郎以財政情況不佳報陸軍大臣桂太郎請協助解決沈傳在總督府支薪問題。

8　《臺灣總督府檔案》第457冊第4件〈事務囑託沈傳外1名御用濟囑託ヲ解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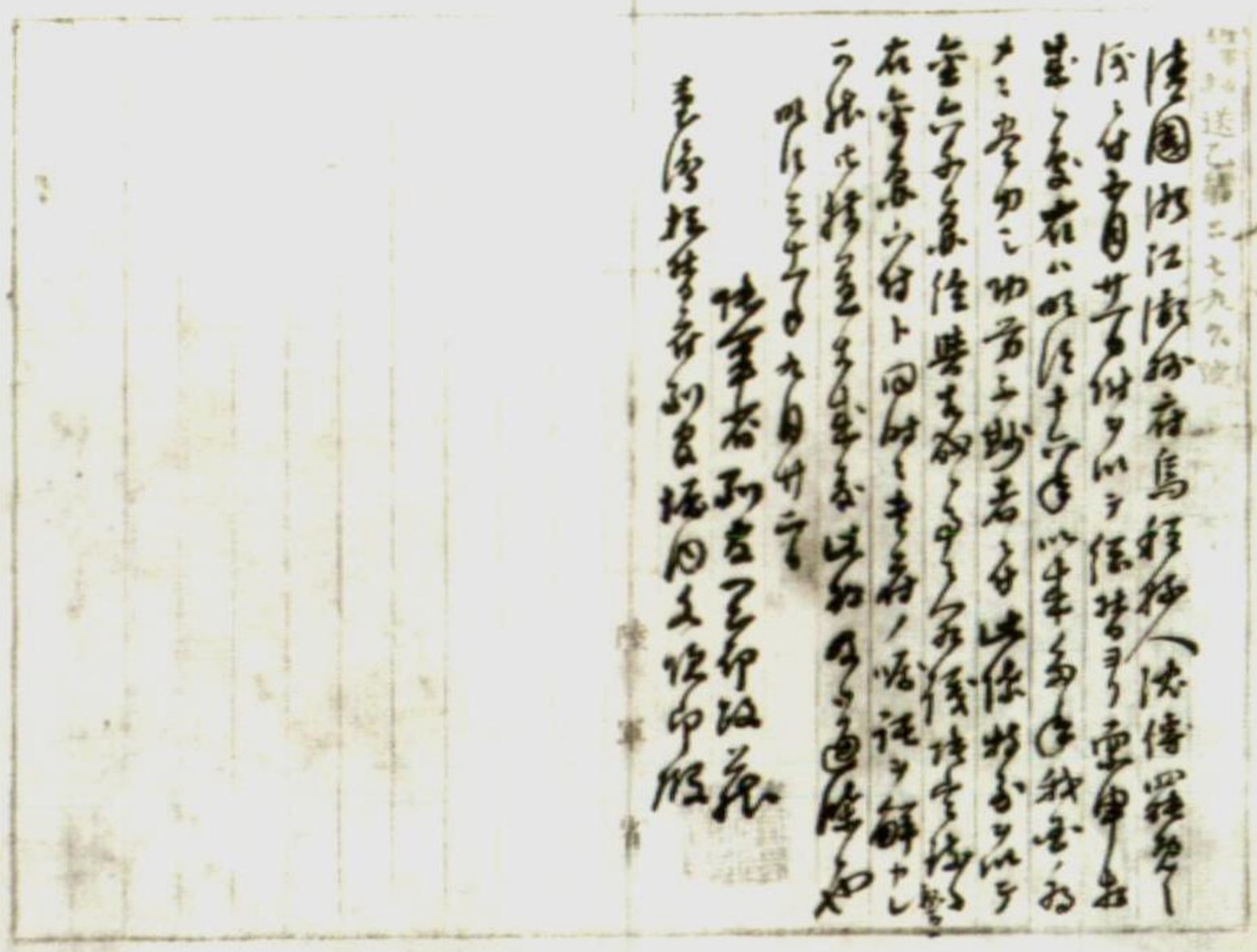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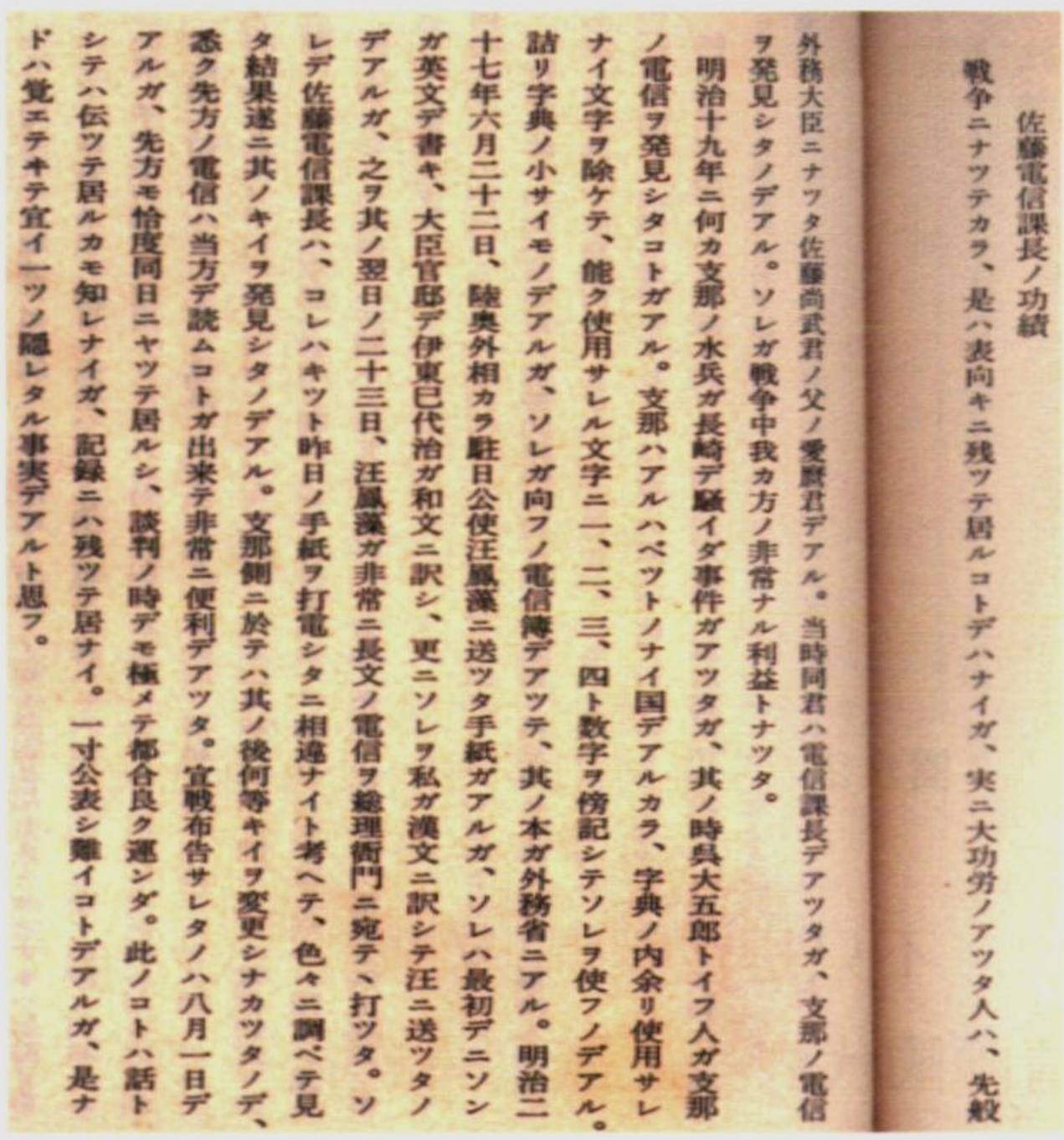


圖5-2　陸軍省副官通知沈傳問題報內閣會議通過給與6,000圓鉅款再讓他離開總督府。

不只是在戰場上如此，談判桌上亦復如此。當時日清兩國代表坐上談判桌之後，清廷談判代表和本國之間的往返電報內容，也都已被日本解讀，清廷談判底線日本方面一清二楚，毫無秘密可言。因為依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在甲午戰爭時期擔任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秘書官中田敬義在日後的口述紀錄顯示，在1886年清廷海軍曾在長崎引發紛擾事件，當時有名為吳大五郎者，即發現清廷電報文是將常用字在字的角落以數目字標出，日本外務省擁有此種電信簿。在開戰之前的1894年6月23日，陸奧外相交給清廷駐日本汪鳳藻公使一封長漢文信，隔日汪鳳藻公使致電北京總理衙門，

當時外務省認為兩者應屬相同內容，佐藤愛麿電信課長詳加比對發現破解電報文關鍵，而開戰之後清廷也未對電報碼作任何更動，讓日方獲得極大利益，兩國宣戰日期會同在這年8月1日也絕對不是偶然。



佐藤電信課長ノ功績

戰爭ニナツテカラ、是ハ表向キニ残ツテ居ルコトデハナイガ、実ニ大功労ノアツタ人ハ、先般外務大臣ニナツタ佐藤尚武君ノ父ノ愛麿君デアル。当時同君ハ電信課長デアツタガ、支那ノ電信ヲ発見シタノデアル。ソレガ戦争中我カ方ノ非常ナル利益トナツタ。

明治十九年ニ何カ支那ノ水兵ガ長崎デ騒イダ事件ガアツタガ、其ノ時呉大五郎トイフ人ガ支那ノ電信ヲ発見シタコトガアル。支那ハアルハベツトノナイ国デアルカラ、字典ノ内余リ使用サレナイ文字ヲ除ケテ、能ク使用サレル文字ニ一、二、三、四ト数字ヲ傍記シテソレヲ使フノデアル。詰リ字典ノ小サイモノデアルガ、ソレガ向フノ電信簿デアツテ、其ノ本ガ外務省ニアル。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陸奥外相カラ駐日公使汪鳳藻ニ送ツタ手紙ガアルガ、ソレハ最初デニソンガ英文デ書キ、大臣官邸デ伊東巳代治ガ和文ニ訳シ、更ニソレヲ私ガ漢文ニ訳シテ汪ニ送ツタノデアルガ、之ヲ其ノ翌日ノ二十三日、汪鳳藻ガ非常ニ長文ノ電信ヲ総理衙門ニ宛テ、打ツタ。ソレデ佐藤電信課長ハ、コレハキツト昨日ノ手紙ヲ打電シタニ相違ナイト考ヘテ、色々ニ調ベテ見タ結果遂ニ其ノキイヲ発見シタノデアル。支那側ニ於テハ其ノ後何等キイヲ変更シナカツタノデ、悉ク先方ノ電信ハ当方デ読ムコトガ出来テ非常ニ便利デアツタ。宣戦布告サレタノハ八月一日デアルガ、先方モ恰度同日ニヤツテ居ルシ、談判ノ時デモ極メテ都合良ク運ンダ。此ノコトハ話トシテハ伝ツテ居ルカモ知レナイガ、記録ニハ残ツテ居ナイ。一寸公表シ難イコトデアルガ、是ナドハ覚エテキテ宜イ一ツノ隠レタル事実デアルト思フ。

圖6 甲午戰爭時之日本外務大臣陸奥宗光秘書官中田敬義，在1938年才口述日本解讀清廷電報文的經過。（見岩波書店出版中塚明校註陸奥宗光原著之《蹇蹇錄》第378、379頁）。

不過此種不重視保密的清廷官方體制，似乎在後續的中國政府還繼續下來。在19世紀末，日本文人出身的矢野文雄擔任駐清公使，即曾上報外相西德二郎，表示有意請清廷軍機處職員蒐集情報，也告知清廷有意加強派員留學，日方宜對清廷政策有所因應。到了國民政府時期，也有打到駐法國大使館的電報被日本海軍攔截的紀錄留在日本外交史料館。在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防止軍事、產業等等機密外洩的措施是否與時俱進？是否完備？確是值得關切的問題。

沈傳這一間諜案例只是諸多間諜案件之中的一件而已，長達近12年持續提供情報才被發現，清廷則已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了。只是這時候的日本政府還似乎認為有照顧這些為日本賣命間諜的責任，並未棄置不顧。而單從文件上仍未能瞭解何以沈傳會提供情報，也許是他進入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卻未被調整職務，以致心中有所不滿，再加上利益因素，才讓他走上間諜這一條不歸吧！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西螺北管子弟團錦城齋

文／攝影 李孟勳

一、前言

臺灣明清時期的漢人移民，主要來自閩粵地區，當時民間音樂「南管」和「北管」，隨著移民流傳到臺灣。清中葉以後，北方音樂「北管」在臺灣廣為流行，到了光緒年間，凌駕於南管，成為當時最流行的戲曲。本來以南管為後場音樂的布袋戲也逐漸改成北管來伴奏。[1]臺灣有一句諺語說：「吃肉吃三層；看戲看亂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而民間以戲曲結社的團體稱為子弟團，他們表演的戲曲稱為子弟戲。一般子弟團都與地方寺廟的關係密切，對於參加的人而言，經由子弟團參與地方活動，具有強烈的光榮感。[2]因此，子弟團

1 邱坤良，〈清代臺灣的南管戲曲活動〉，收入許常惠編，《中華民俗藝術年刊：國際南管會議特刊》（臺北：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81），頁85。

2 邱坤良，《野台高歌》（臺北：皇冠，1980），頁28－32。

具有信仰、社交、藝術、娛樂等功能。

本文藉由西螺的北管子弟團「錦城齋」的相關活動及文物，探討傳統音樂的變遷。

圖1 錦城齋主祀西秦王爺

二、戰前錦城齋的活動

清末倪贊元的《雲林縣采訪冊》提到演戲與民間信仰的關係：

> 俗尚迎神演戲，街衢莊社1年數次，餘積貲財，多備此項開銷。[3]

位於西螺延平老街的媽祖廟福興宮裏，有一立於明治45年（1912）的「逐年祭典演劇公置田租碑」，明示公置土地「壹甲貳分叁厘五毫」之田租是為了「恭祝聖母千秋」演戲之用。

3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9。

圖2「逐年祭典演劇公置田租碑」正面、背面

西螺當地有俗諺云：「聽曲街仔頭錦城齋，看武街仔尾勤習堂」。[4]根據昭和3年（1928）4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 西螺農村。極為餘裕。生活程度。鮮聞困難之聲。去6日古曆元宵。天氣融合。月白風清。該街媽祖廟前。及街尾加藍爺廟等處。均演梨園。詣廟繞香祈神。紅男綠女。絡繹不絕。該街兩飛龍團。亦出弄龍。以助餘興。[5]

從這篇報導可知，1920年代的元宵節，街仔頭的媽祖廟福興宮和街仔尾的伽藍爺廟都有演戲酬神，很可能

4 程見勝，《西螺演義》（斗六：雲林縣文化局，2003），頁110。
5 〈西螺〉，《臺灣日日新報》，1928.4.28，第4版。

就是錦城齋和新樂軒的子弟戲。

當時，西螺的兩大北管樂社，每年農曆6月24日北管戲神西秦王爺祭典，兩館會競演子弟戲，根據昭和8年（1933），《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 西螺街北管。新樂軒。錦成齋例年于舊曆6月24日。舉行西秦王爺祭典。目下期日已迫。兩派各忙於準備。而新樂軒與錦成齋。為往年關係。按自23日。雙方各盛行演戲。26日。兩派館員。復上臺演子弟戲。然西螺方面。自入第一期收穫。遭米價暴落。商界多受打擊。者番值西秦王爺祭典。各商人亦皆欲乘機活躍欲恢復商況。屆期定卜熱鬧云。[6]

次年西秦王爺祭典，《臺灣日日新報》仍有類似的報導：

> 虎尾郡西螺街。新樂軒。及錦成齋兩鉅子弟。原分兩派。每屆西秦王爺誕期。各高築華麗戲臺。裝飾錦屏彩燈。由兩館團員。主演子弟戲。及雇他處之戲來演。本年又屆其期。早由值東。豫先發柬。邀請一般關係者磋商。擬定來古曆6月23日起。凡四日間。到期當有

6 〈祭典先聲〉，《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3.8.12，第4版

一番之熱鬧。可以幾分影響于市況云。[7]

由以上的資料我們得知，到了1930年代西螺仍有「新樂軒」和「錦城齋」兩大子弟團互相競爭的局面，每年西秦王爺誕辰時，除了舉行祭典外，並上演子弟戲。除了傳統的祭典外，子弟團亦參與在西螺戲院舉行的音樂會，根據《臺南新報》的報導：

目的慰安民眾。並涵養優雅音樂趣味。期日1月2日午後7時起。場所在西螺大舞臺。參加者小公學校生徒。鶴鳴社官音研究會。錦城齋。新樂軒。清□閣南音研究所。但入場無料。[8]

西螺戲院建於1930年代，與錦城齋同位於東市場邊的觀音街上，形成西螺街的娛樂中心。昭和7年（1932），為了籌備武器資金和慰問出征軍隊，西螺街長廖重光、分室主任小平晃、方面委員鄭錦如等人發起素人演劇會亦於西螺大舞臺公演：

這回為欲籌備兵器□金、和慰問出征軍隊起見、前天西螺街長廖重光、分室主任小平晃、方面委員鄭錦如諸氏發起、組織素人演劇

7 〈演子弟戲〉，《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4.8.4，第4版。
8 〈開音樂會〉，《臺南新報》，1933.12.20，第12版

會、已於本月10日夜在西螺大舞臺演過。當夜演題共7齣、劇名和出演者如左：一、草橋關（本島人方面出演）二、天水關（同上）三、萬國競技大會（學校方面出演）四、滿子的運命（內地人方面出演）五、神乎人乎（本島人方面出演）六、別窯（同上）七、釣金龜（同上）當夜出演人員除西螺街在住內臺人以外、還有由嘉義、斗六前來應援的、又有華人數名和藝妲數名參加、俱各熱心扮演、故博一般的好評。而入場券亦因利用保甲役員配給、故當夜觀□不下千名的盛況、但對4歲以上就要徵收5角、此點稍有非難云。[9]

其中臺灣人演出的「草橋關」、「天水關」、「別窯」、「釣金龜」等，即北管戲的劇目。

圖3 西螺戲院已停業

9 〈地方通信・西螺・方委演劇盛況 4歲就要5角〉，《臺灣新民報》，1932.3.19，第9版。

三、成員與社會網絡

錦城齋位於西螺鎮市後街，其創立於何時，由於相關文物的喪失，並無史料可考。目前僅能從館內牆上的先輩祿位碑，上面刻有136位前輩的名字，可用來考察其成員的時代及社會網絡。

圖4 先輩祿位碑

先輩祿位

陳廷	高採賓	陳福求	周六畜	蔡秋風	廖懋昭	江有成	詹東	林仁和	林登科	廖喜	蔡青番	高榮	陳光明	黃馬
林火國	胡火樹	陳新賀	高木印	姚加和	廖福城	陳養	王玉珍	邱添枝	林虱母	林屋	周泉	詹福壽	蔡皮	黃旺
林福開	王乞	李珍	林新春	陳送	林益	蕭臭獻	王添泉	廖火山	黃萬枝	廖容	郭結	李江山	廖貓	萬棟樑
詹溪水	吳再德	王重燕	鍾清音	廖進	廖福陽	蕭玉成	廖水往	林義	莊開	廖錐	林文	廖番王	廖心園	蕭盛
高蕭恆	廖永昌	程鴻文	程喜	王廷瑞	文太高	文永漢	詹萬發	劉毛	廖永盛	黃添	王和尚	王坤	廖送	陳熙祥
詹萬春	蕭慶瑞	廖文曲	廖景深	余再添	李枝清	洪坤林	李良	李謀番	廖朝梅	莊春德	廖夏雨	林主	廖大七	廖文淵
廖祿	郭自在	江乞食	蔡雨	江連瑞	江怨	林連	廖大塗	林允枝	李叁	黃財	李國誥	江漢	鄭文儀	廖大村
蕭石枝	謝瑞	廖知	歐秋桂	陳炎生	林緇虎	李聰水	蔡文慶	蔡力	謝天賜	蔡芳榮	廖萬枝	李新來	蘇木	歐儒
蕭慶賢	王進發	蕭萬草	詹振發	萬太平	蔡金旺	廖學鐘	毛福	劉敏勝	廖龍壽	程振祥	林知高	陳清海		
廖春欉	廖天祐						高石貴							

民國85年重建

廖清桐

經察目前得知的先輩資料如下：

1、黃馬，本名黃俊秀，人稱「馬師」，是布袋戲大師黃海岱的父親，黃馬曾要求黃海岱到錦城齋，拜王滿源學唱曲，奠定其布袋戲唸唱的基礎。[10]可見，黃家後來發展成布袋戲王國，是得力於子弟團打下的基礎。

2、詹福壽，是新街老大媽廣福宮的董事，[11]日治時期也領導三山國王廣興宮遶境事宜，根據1932年《臺南新報》的報導：

> 來舊曆2月25日西螺三山國王爺誕生日。當地詹福壽、魏江兩人。熱心奔走。準備迎三山國王及其他所在各寺廟諸神。出巡遶境。當日神輿10數頂。藝閣20餘種。南北管、獅陣10數陣。其他布馬、火龍。種種假裝行列。不遑枚舉。皆是奇珍奪目。真足以遊目聘懷。屆期定必一番熱鬧矣。[12]

次年三山國王遶境，《臺南新報》也有類似的報導：

> 西螺三山國王。本月舊25日誕生日。例

10 陳木杉編著，《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暨布袋戲宗師黃海岱傳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315。

11 據廣福宮內保存的同治甲戌年（1874）重建牌記，載有「正董事詹福壽」等字。

12 〈地方通信・西螺〉，《臺南新報》，1932.03.24，第8版。

年由詹福壽氏提唱繞境出巡。是日當地10數位廟宇神輿盡出。參加餘興。有獅陣、火龍、10數陣。洋樂隊。及子弟音樂團78團。其他布馬。大小彩旗。行列蜿蜒1里餘。是日中北部之來客。及鄰郡來觀者人山人海。真是空前絕後之熱鬧也。[13]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可以得到下列3點：（1）詹福壽是廣福宮和廣興宮的領導人物，（2）當時三山國王的遶境隊伍，有當地寺廟鑾轎十數頂之多，（3）1930年代初期的陣頭活動仍非常興盛，種類和數量亦多，包括藝閣、南北管子弟音樂團、獅陣、布馬、火龍、假裝（即扮裝）及洋樂隊等。有延續清代的傳統，也有日治時期新增的，如化粧遊行、西樂隊。

3、莊春德，生於光緒10年（1884），本籍虎尾郡西螺街，住於虎尾街，做過虎尾郡漢藥種商組合長。[14]

4. 李謀番，生年不詳，本籍虎尾郡二崙庄，受漢學教育，曾任二崙庄協議會員、油車區長。[15]

5、陳炎生，生於光緒4年（1878），本籍埤頭小埔

13 〈西螺三山國王 神輿遶境 極呈盛況〉，《臺南新報》，1933.03.17第8版。

14 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發行，1934），頁239。

15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3），頁774。

心，受漢學教育，曾任埤頭庄長、小埔心保正、北斗水利組合評議員、埤頭庄協議會員、小埔心農業組合長、埤頭信用組合長。[16]

從以上錦城齋的「先輩祿位」初步考察，除了寺廟頭人、傳統藝師外，亦有知識分子和地方仕紳等。而其創立年代，據推測最遲應在清末日治初期。

四、戰後的變遷

早期北管盛行時，各大小村落都有1團以上的子弟團，到了戰後初期，全臺的北管子弟團仍有上千團之多。[17]但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口傳心授」的傳統藝術，逐漸在工商業社會中沒落。

2003年，螺陽文教基金會為了重振錦城齋，找回昔日成員及社區民眾，成立「螺陽錦城齋」，並聘請老師指導。[18]團員平時利用晚間於太平媽福興宮練習，太平媽遶境時則擔任轎前吹。

筆者希望日後藉由深入調查西螺寺廟的相關文物與活動、尋找散落在民間的曲簿與老照片、現存館員的口述訪談，找到更多西螺地區北管的資料。

---

16 洪寶昆編，《北斗郡大觀》（臺中：北斗郡大觀刊行會，1937），頁137。

17 邱坤良，《野台高歌》（臺北：皇冠，1980），頁33。

18 何美慧，《西螺延平老街的日記》（西螺：螺陽文教基金會，2006），頁96。

圖5 錦城齋團員於太平媽福興宮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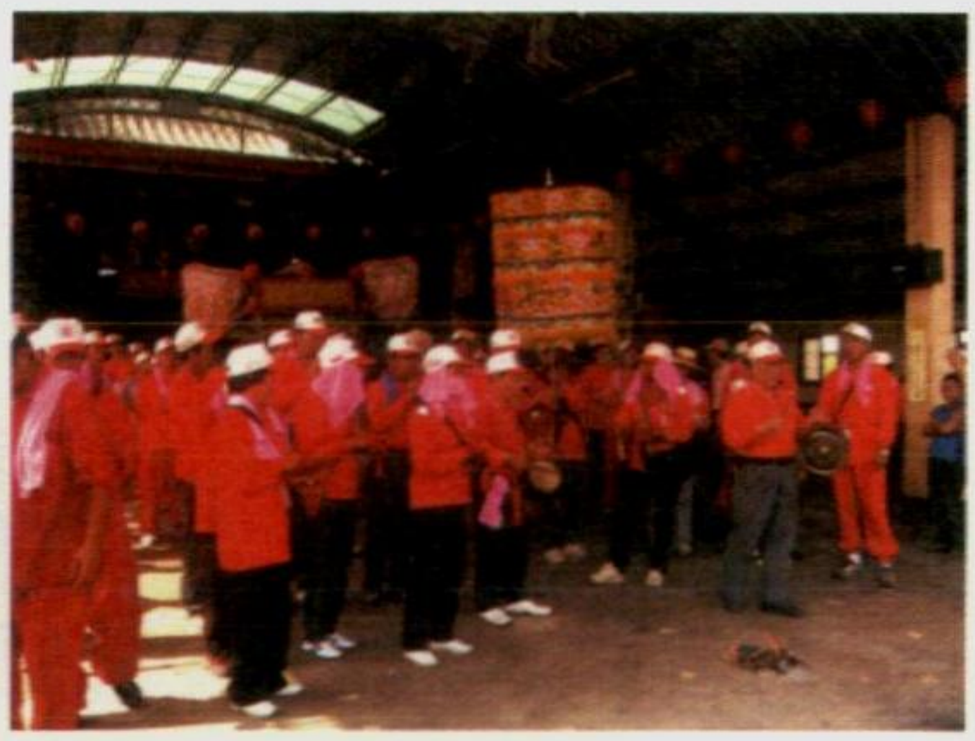


圖6 2009年太平媽遶境

（李孟勳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生）

列入日本土木遺產的國定古蹟「臺南水道」

文／圖 陳正美

前言

臺南市山上區國定古蹟原臺南水道，獲日本土木學會認證為日本重要土木遺產，民國99年12月12日在此地舉行授證儀式，日本土木學會理事長阪田憲次專程前來授證，這是繼烏山頭水庫之後，大臺南市第二處獲該學會認證的文化資產。

臺南山上淨水場，即原臺南水道，係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為改善臺南地區飲用水質，避免霍亂傳染病危及群眾身體健康，因而繼臺北水道後興建的自來水工程。該項工程自1912年開工，由濱野彌四郎主持興建案，原預計4年完工，期間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素的波及，因而延宕至1922年始完成。這一自來水系統，徹底改變了當時大臺南地區的飲水衛生，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日治水道設施，對於解讀自來水系統之現代化進程具有其歷史意義。

歷史背景

1897（明治30）年，由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技師巴爾登（W. K. Burton）與其學生兼助手濱野彌四郎進行臺南地區的水源、水質的調查，並就實地調查結果提出快濾式過濾法之水道建設意見。1912（明治45）年，臺灣總督府送本計畫交第28次帝國議會審查通過，以263萬圓之預算開始進行建設。期間因受到官制的改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因素的影響，一直延至1922年（大正11）10月31日始竣工供水，整個工期共歷時10年之久。

「臺南水道」的水源取自曾文溪的地表水，經唧筒揚水至沈澱池沈澱再送至濾過器室，經濾材或加藥（加入明礬、曹達藥劑…）過濾等過程，達到淨水標準，再利用送出唧筒室將水送至南側的山上淨水池內貯水，最後以

圖1 日治時期濾過器室與水道辦公室整體外觀，引自1918年《臺灣水道誌》

圖2 水道辦公室之拱廊外觀

重力給水方式，將水送至市街內，供應整個臺南市居民的民生用水。

臺南水道工程師－濱野彌四郎

水源地大門旁有一紀念「臺南水道」設計者濱野彌四郎的碑座暨銅像，碑座上嵌有銅牌，敘說立像原由，為濱野對臺灣之貢獻留下佐證。

基座下方鑲著一塊銅鑄的紀念碑，內文如此記載：

> 濱野君千葉縣佐倉人也，資性溫雅，持身謹嚴。明治29年7月畢業帝國大學工科。當時臺灣歸我帝國版圖未幾，衛生設備缺如，同胞之斃於瘴癘者，不遑枚舉。君奮然提少壯之軀，來奉職臺灣總督府，至大正8年4月辭職，其間前後23載，始終一貫參劃衛生設施，俾臺灣衛生設備，有隔世之感，其功績可謂偉矣！中如臺南水道之策計，猶君心血最為灌江之處，排萬難以期於成，閱10有1載。克竣厥功，化疫癘之地而為樂土，其努力有足多者。余之於君，相識有歲，茲際立像之舉，用誌不朽，爰述數言，鐫之於銅云爾。
>
> 大正10年11月
>
> 友人　木村　匡

濱野君就是1896年隨巴爾登來臺的土木局技師濱野彌四郎，而木村匡則是1895年隨首任臺灣總督來臺的總督府官房記錄課長兼經理課長，後為民政局文書課長府內殖產課長、學務課長。顯然這是臺南水道竣工啟用之時，為紀念當時致力於臺灣上水道乃至臺南水道的濱野彌四郎而設，而基座上面本應塑立他的銅像。依據成功大學土木系李德河教授的調查指出，彌四郎的銅像乃約4尺的胸像，大約在1943年（昭和18年）或1944年，為當時水道局矢野股長所拆撤，可能是戰時作為回收金屬，預備溶解作為軍事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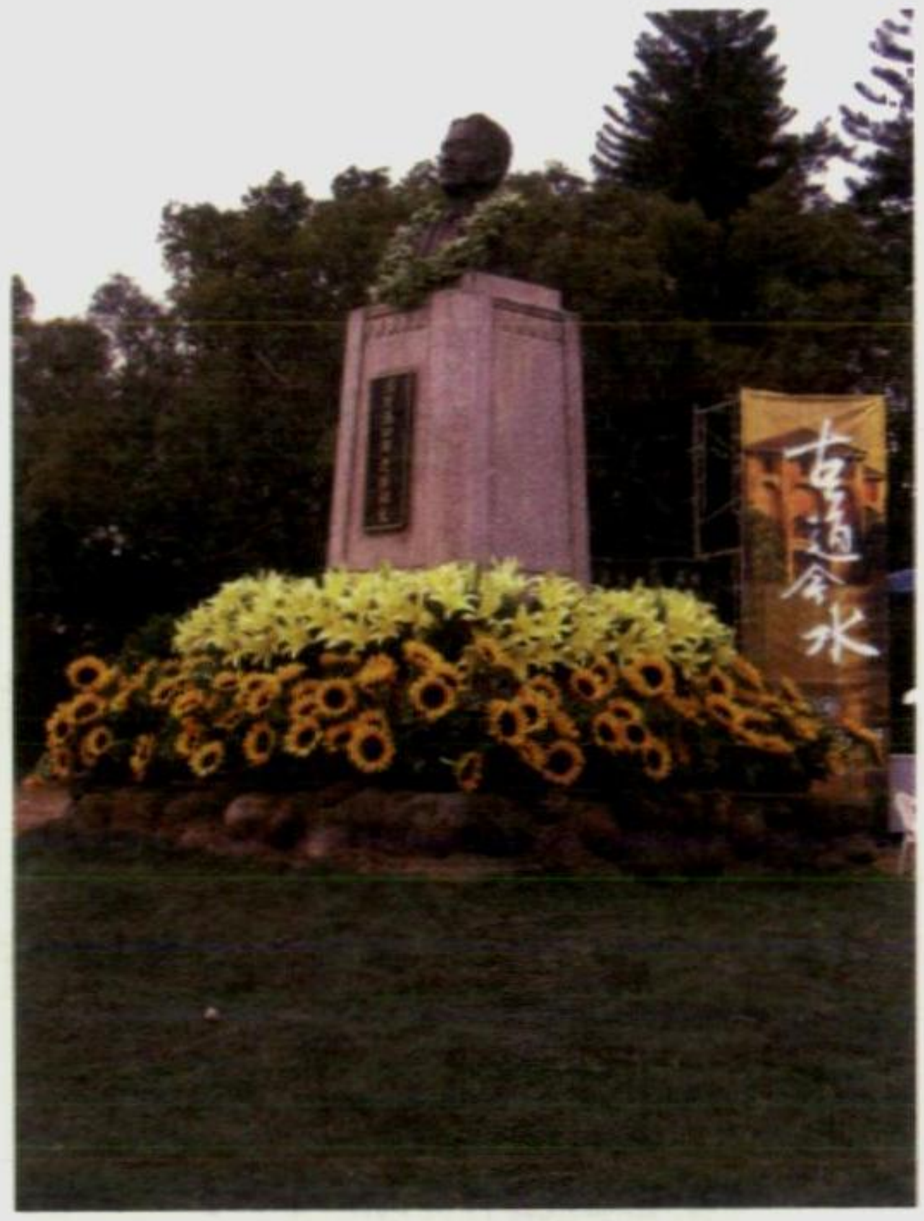


圖3 濱野彌四郎碑座暨銅像

原銅像最後命運為何？迄今逾60載去向成謎，原奇美實業董事長許文龍先生於93年底參訪山上水源地後，有感於濱野對臺灣地區環境衛生及飲用水改善的貢獻，允諾將塑造新銅像，重立山上水源地供後人景仰。94年5月16日在奇美文化基金會紀慶玟經理的見證下，安置在原碑座上。

日治臺灣上水道的整體規劃單位屢有變更，興建

臺南水道時由總督府土木局負責，土木局下轄庶務、營繕、土木與主計等課，其中營繕課負責調查與規劃，土木課負責工程的執行與監督，而執行與監督臺南水道工程者，即為濱野彌四郎，職稱「臺南水道工事主任技師」，亦即臺南水道工程的總工程師。

濱野彌四郎原名黑川彌次郎，1869年（明治2年）9月9日誕生於千葉縣成田市。1888年（明治21年）11月13日，彌次郎正式過繼給醫生世家的濱野昇為養子，濱野彌四郎於焉誕生。

濱野彌四郎先入一高，曾留級1年，但仍考入唯一的帝國大學，於1893年9月進入帝國大學工科大學，跟隨英國籍講師巴爾登學習「都市醫生」的技術—上下水道工程。

影響彌四郎最為深遠者，莫過於帝大的老師巴爾登。巴爾登，1856年5月11日誕生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父親John Hill Burton為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博士。1873年巴爾登畢業於愛丁堡工業專門學校（Edinburgh Collegiate School），隨即進入當地的Brown Brothers事務所從事土木建築相關機械製造，以及河川、港灣等工程建設技術，奠定日後從事衛生工程的重要基礎。1887年（明治20年）5月，巴爾登受日本政府與帝國大學的邀聘，正式成為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雇用技師，以及帝國大學工科大學衛生工學教師。

巴爾登至日本後，除任教職外，擔任東京市區改正委員會上下水設計調查委員會主任時，不僅改善東京市上下水道的設計，也致力於神戶市、仙臺市、名古屋市、下關市、大阪市、廣島市等多數都市之調查與設計計畫。教學方面，巴爾登於1887年9月新學期開講衛生工學，涵蓋都市上下水道與設計，1894年（明治27年）將講義刊行，亦即《The Water Supply of Towns》（都市の給水）一書，時值濱野彌四郎進入帝大土木工學科的第2年，在巴爾登的引領下，彌四郎展開探索衛生工學的生涯。

1896年5月，在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的推薦之下，巴爾登獲聘為「臺灣總督府衛生工程顧問技師」，專事衛生工程之調查設計，並延攬剛剛畢業的濱野彌四郎為助手，擔任總督府衛生工程囑託，協助巴爾登事務的進行。同年8月2人渡臺，9月彌四郎被任命為民政局技師，展開師生2人在臺從事衛生工程的使命。

從1896年8月巴爾登與濱野彌四郎展開臺灣衛生工事調查，到1899年8月巴爾登病逝於東京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師生先後完成對臺北、基隆、臺中、淡水，以及臺南、安平、鳳山、打狗、恆春、嘉義、澎湖等地的衛生工程調查與對給水法的設計建議。其中對臺南的給水法認為，在城內欲鑿井取得良善的飲用水勢困難的，有鑑於此，他認為曾文溪為本島南部的大河流，它的水量

非常充分，建議臺南的給水水源應由曾文溪引用。更具體的提出「自然流下法」與「唧筒法」兩種導水方法。整體而言，後來臺南水道的設計方式，可謂濱野彌四郎承繼乃師的概念加以具體化，可說是其師生在臺水道建設的共同結晶。不過，1919年9月彌四郎可能應神戶市技師長佐野藤次郎之邀請，返回神戶市擔任水道課課長，次年接替佐野為技師長。1932年（昭和7年）12月30日去世，享年64歲。

除了濱野彌四郎外，參與臺南水道工事而後來對臺灣也有深刻影響者有八田與一。興建臺南水道當時，八田與濱野統屬土木局同僚技師，並負責臺南水道工事現場的監督與驗收，如1916年3月31日由鈴木組（負責人：鈴木學）包工建造完工的淨水井上方的遮蔽工事（上家），即八田與一負責驗收，而監工為技手木間四郎。依據濱野彌四郎的兒子濱野秀雄的回憶指出：

> 八田先生在總督府附近有固定的官舍，與我家的官舍相近。八田先生常常到家裡來一起共度晚餐，我因此而感到快樂呢，非常的親密。

可見，八田與濱野關係不僅只是同僚更是好友吧！前述臺南水道濱野的銅像，據說建造發起人即八田與一。

八田參與臺南水道的監督、驗收工程中，或許因而得以深入瞭解曾文溪的水文現象，1920年至1930年他執行嘉南大圳的鉅大工程中，就是引曾文溪為水源之一建烏山頭水庫，1930年全部完工，除攔截官田溪的溪水外，亦建隧道引入曾文溪溪水。

自來水取水、導水、淨水及配水設施

（一）水源的選定

1897年7月總督府衛生顧問技師巴爾登（W. K. Burton）與濱野彌四郎，進行臺南地區的水源、水質的調查。最初，巴爾登曾倡導以地下水為水源，後經屢次鑿井試掘，因地層多為黏土與細砂，不僅無法達成目的，且地下水中含有多量的有機物，並不適合飲用。就長遠而言，巴爾登建議臺南給水水源應引用曾文溪。巴爾登去世的10餘年後，臺南水道的水源地就是當年巴爾登的建議以曾文溪為水源，而由其學生濱野彌四郎監督、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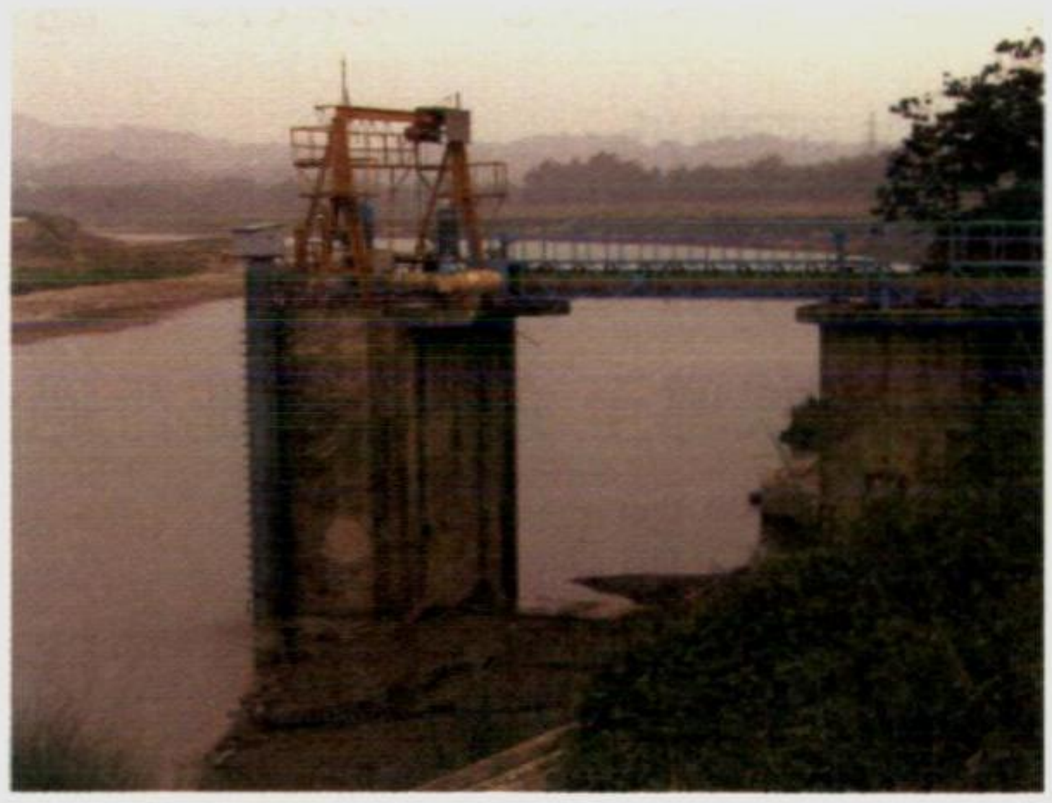


圖4 取水塔

（二）取水設施—取水槽、導水井、集水井、與第一唧筒井

取水系統的功能有二項，一則匯集曾文溪的溪水；二則將此收集到的原水用動力抽水機壓送至沈澱池。簡言之，亦即集水與抽水兩項任務。取入口的取水設施包含取水槽、導水井、集水井與第一唧筒井（抽水井）等四項設備，以及為改善溪水與溪岸的護岸工事。

（三）淨水設施—沉澱池、濾過器室

（1）沉澱池

原水壓送至沈澱池，進行沉澱後，再由各池藉自然重力方式導至濾過器室進行過濾。

（2）濾過器室

原水從沈澱池到濾過器室最少約有3.3公尺的落差，利用此自然重力將原水壓送至過濾裝置除去雜質，而臺南水道所使用的過濾設備，在當時是頗為特殊而先進，且獨一無二的。14座快濾筒，每座濾筒內裝約2萬斤的硅砂作為濾材；並設自動給水閥控制濾筒的流水量達到最佳過濾效果，每座濾筒並備有沖洗裝置，可

圖5 快濾池室立面

定期沖洗濾材，維持濾水的品質。

（四）導水設施—送出唧筒室

原水經濾過器室過濾後就成為潔淨的飲水，淨水自然流入送出唧筒室外側的「第二唧筒井」，再經由唧筒室內的動力泵壓送至淨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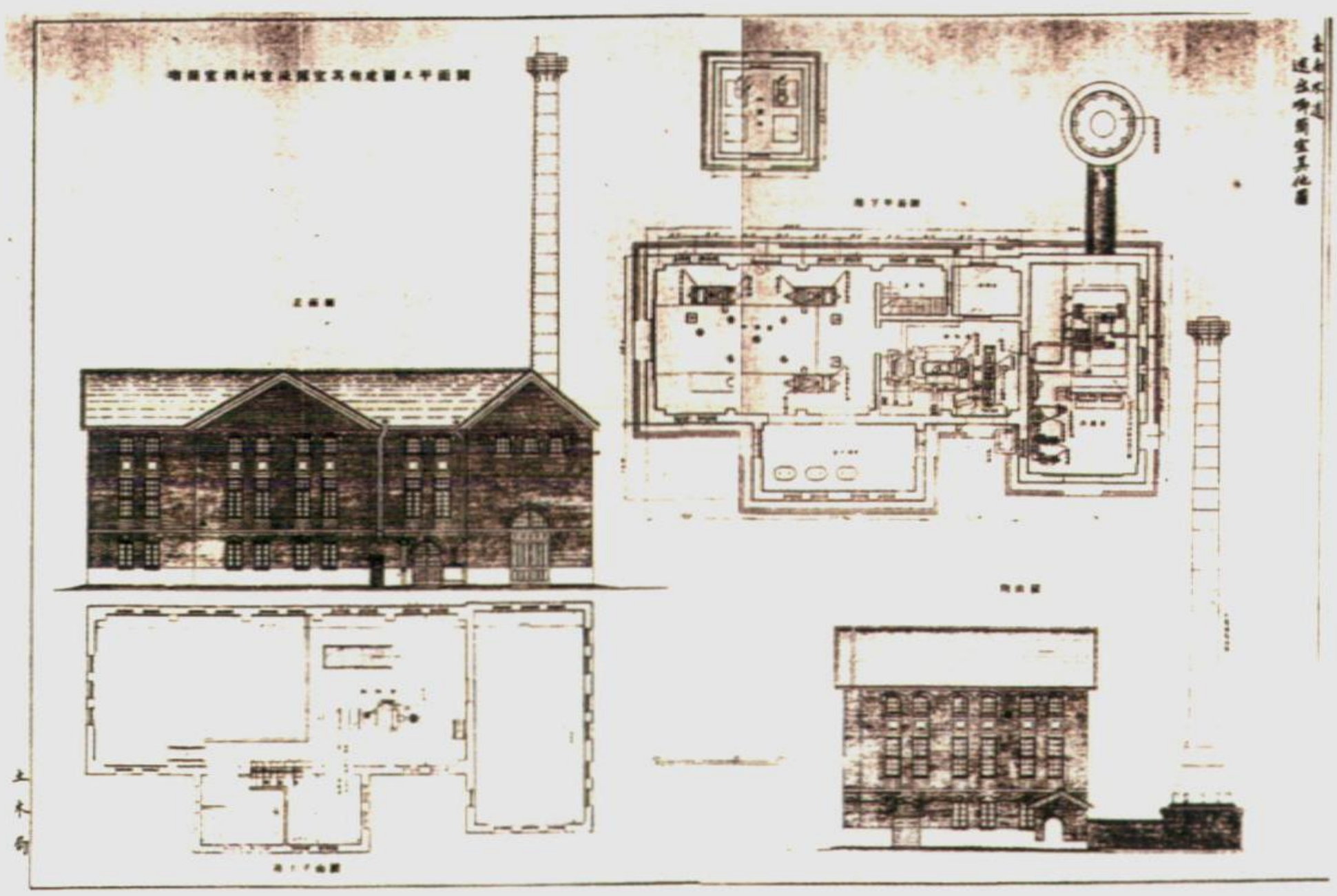


圖6 舊圖說－送出唧筒室平面及立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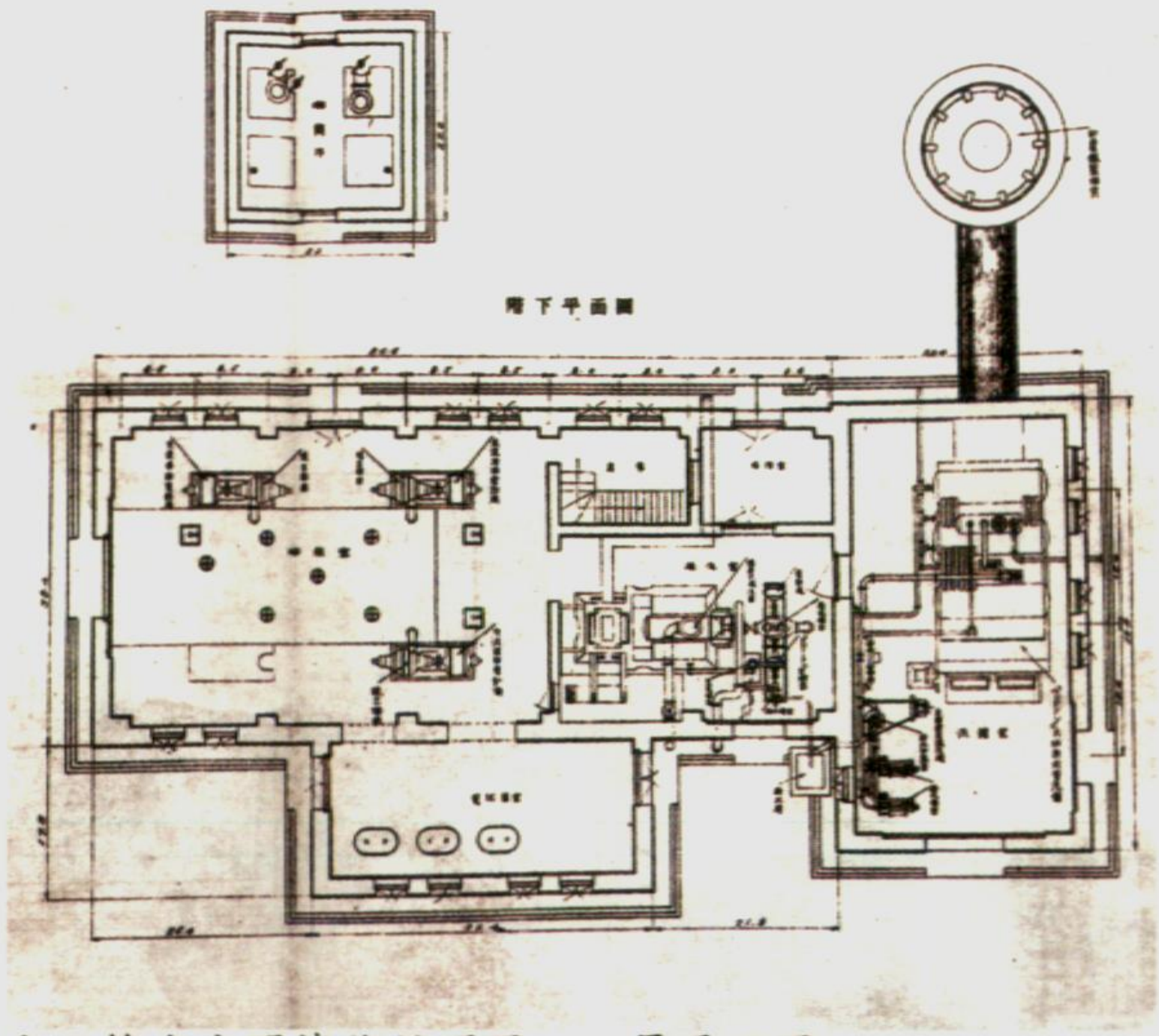


圖7 送出唧筒室空間機能說明圖：一層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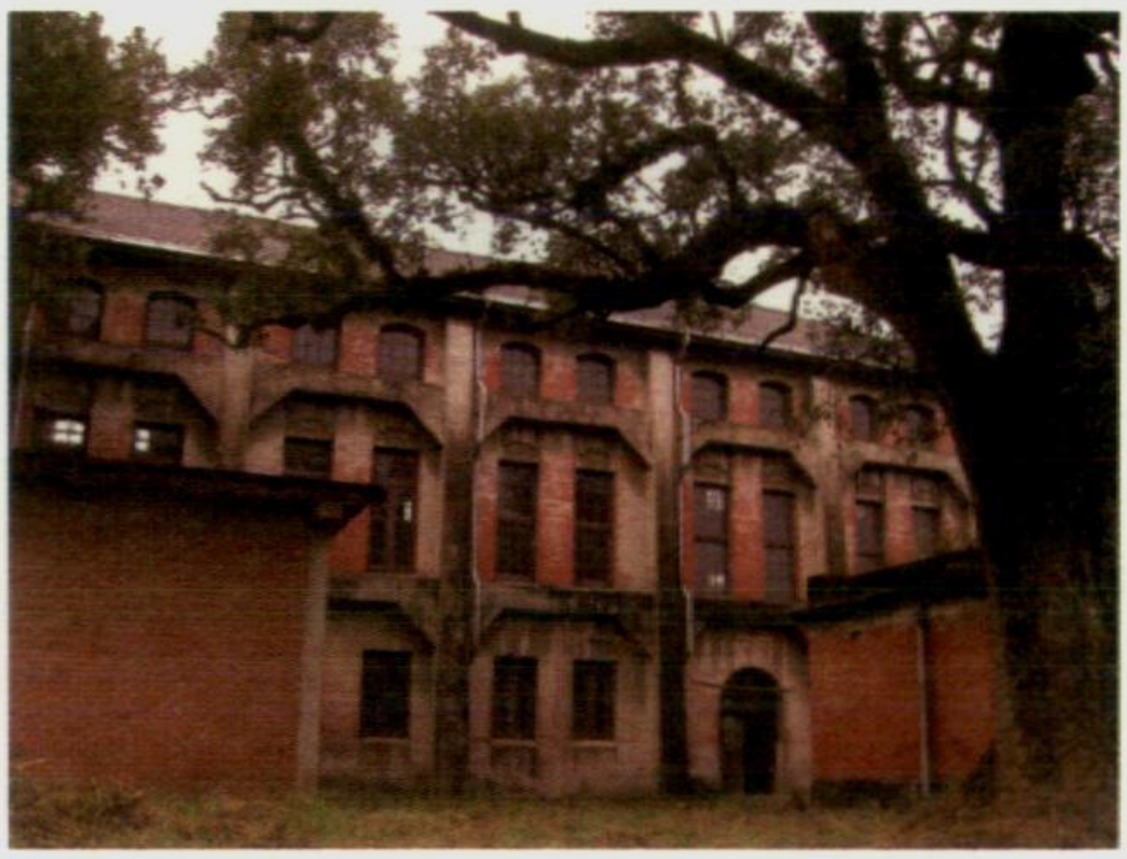


圖8 送出唧筒室北向外觀

（五）配水設施－淨水池

淨水池其主要功能除了貯存之外，另一項功用為調節水源之用。滿水位時為海平面77.3公尺，比臺南火車站鄰近周邊高出約60.6公尺，以此60餘公尺的位差所產

生的自然重力，將淨水送至位於臺南火車站北側的水道事務所，以控管配送臺南街市用水。

圖9 淨水池

圖10 水質檢驗室外貌

小結

臺南水道工程，採用動力泵與自然重力所構成的抽水、沈澱、過濾和給水的自來水系統；充分運用地勢位差，以三重重力節省能源使用，自曾文溪地表取得水源，經沈澱、過濾後再送至淨水池貯水，最後利用淨水池與給水區的地勢落差所產生的自然重力，將水送至臺南市；整體工程範圍包括水源地及淨水區等兩大區域。

1890年來臺的濱野彌四郎，規劃臺灣上、下水道長達23年，對於嘉南地區飲用水源的貢獻，使早期臺灣人脫離飲用河水、井水、地下水，改善居民衛生品質及延長壽命著力甚多，而令今人念茲在茲。

戰後，在烏山頭水庫與曾文水庫的陸續完成而卸下給水重責，並將多數舊有廠房設施除役；1974（民國63）年自來水公司成立後，水源地乃劃歸自來水公司管理。所有器械及建物於1982（民國71）年功成身退迄今；目前由自來水公司第六管理處管理，礙於水源安全考量，一般並不對外開放。

「臺南水道」相關設施，見證了日治時期衛生工程現代化的發展歷史，對大臺南地區之經濟發展亦有相當的貢獻，其建築與空間形式頗具特色，經臺南縣政府於2002年的古蹟審查會議中，將其指定為縣定古蹟，2005年復經內政部審查為國定古蹟；其實質價值逐漸獲得珍視，不但成為縣內鄉土教學參觀的重要景點之一，也成為國家重要的文化瑰寶。

土木学会選奨土木遺産
認定書
台南水道
右は浜野弥四郎氏の計画・設計と施工監理による当時の最新技術である急速濾過法を採用した大規模な浄水場であります
本学会ではその歴史的土木施設としての高い価値に照らしここに平成二十二年度土木学会選奨土木遺産と認定致します
平成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社団法人 土木学会
会長 坂田 [illegible]

圖11 原臺南水道獲日本土木學會認證為重要土木遺產證書

它擁有豐富植栽的水源地，一直是動物、昆蟲絕佳的棲息地，再加上此地是水源保護重地，而未受污染或破壞，故能留下豐富完整的生態環境。原臺南水道建築外觀及設備大都保持原貌，2002年經臺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且2005年經內政部審查後，已定為我國第19處國定古蹟。現在不僅是鄉土教學之重要景點，未來，更足以發展為日人之重點觀光旅遊勝地。

擁有豐富林相及原始生態之原臺南水道，如今靜靜伸展著雙臂，邀請您的探訪，期望您看見的不僅是建築的外觀、歷史的遺跡，而是一份超越了時間、空間與民族情操的人文感動。

（陳正美　財團法人紀念八田與一文化藝術基金會副執行長）

從「三更燈火五更雞」到「秒殺」：臺灣時間的故事

文／李西勳

古人詩文裡常見「三更燈火五更雞」，描寫士子們科舉生活，讀書到三更半夜才歇息，五更天剛破曉又起床繼續用功，十載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吟唱〈紅豆詞〉：「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先民傳唱〈五更鼓〉民謠：「一更更鼓月照山，牽君仔的手摸心肝；二更更鼓月照埕，牽娘的手入大廳；三更更鼓月照窗，——；四更更鼓月照門，——；五更更鼓天見光，——。」，唱出纏綿繾綣之情愛。而1887年（光緒13年）劉銘傳所興建基隆－新竹鐵路，火車時刻表寫的是：「辰開午返；未開酉返」。從這些時間詞語，足以看出，關於時間的計量，古時候和現代有很大的差異。

古時候，一般人生活在田園或山隈水畔，終其一生，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正是俗話所說山中無甲子。對於時間的計算，是從季節變化，仰望天空

日月星辰來推算日期，低頭看地面的日影推算時辰，如此而已。至於居住在城裡的人家，因生活機能比較豐富，當太陽西沉，夜幕來臨時，日晷就無用武之地，晚上就用炷香、滴漏來計量時辰。寺廟或城裡中心位置常有鐘鼓樓，用來報時，是所謂的晨鐘暮鼓。白天撞鐘兩次，一次在寅時天亮稱亮更，另一次在戌時入眠為定更；到了深夜則擊鼓，戌時起每更次擊鼓兩聲，直到次日寅時擊鼓10聲為止。城裡或村落、大戶莊院還會有衙役或專司報更的更夫，定時報更，讓大家知曉時辰，配合作息。更夫一個晚上報五次更，以一炷香2個時辰計算，或以滴漏竹箭浮出水面的刻度計算時辰。晚間9時為一更、11時為二更、凌晨1時為三更、3時為四更、5時為五更，報更時以更板敲響一聲為一更，二聲為二更、、、，每敲完更板後再敲一聲銅鑼為號。

這種傳統計時報時的方式，於1895年（明治28年）日本領有臺灣，有了很大的進步。當年12月27日，日本天皇敕令公布帝國中央標準時間，而以東經120°子午線的臺灣及澎湖列島、八重山及宮古列島為西部標準時間，自1896年1月1日實施。（圖1）從此，臺灣社會進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系統，與國際接軌，開始以分秒為單位計時的現代時間，有別於中國兩千餘年來以時辰計時的傳統時間。

圖1 臺灣實施標準時間敕令

臺灣總督府首先於1895年創立臺北測候所，開始時間之測定，以英國倫敦格林威治天文鐘為標準時間，以子午線經度計算，每15°時差1小時計算，臺灣本島位於東經120°，與格林威治時間相差早8小時，與日本內地中央標準時間相差晚1小時。起初，為了提供社會大眾校正時間，1895年6月27日起，由陸軍砲兵每日正午12時在臺北城西門旁胸壁上發放號砲報時，稱午砲。為免市民被午砲驚嚇，所以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通知臺北縣廳預告市民，免受驚懼。（圖2、3）隨而，臺中、臺南一體實施，由當地駐紮陸軍砲兵發砲。（圖4）1904年（明治37年）6月總督府通信局在臺北、臺中、臺南

郵便電信局裝置自動報時器，連通全島各電信線路，供民眾對時。[1]1913年（大正2年）天測室竣工，使用4.5吋望遠鏡作恆星測定標準時間，提供船隻航海時辰儀校正時間，同時規定各火車站、郵電局等單位，每日午前3分鐘以電話或電報向臺北測候所對時，建立全臺報時系統。1921年（大正10年）陸軍因經費問題，停止發放「午砲」，然而有些城市、街庄士紳們自行組織「午砲組合」分攤約30元的火藥、人事費，繼續發放午砲供居民們對時。1928年（昭和3年）設立放送電臺，從收音機即可以收聽報時，人們對時更為方便。

000000390170142

[redacted]

明治廿八年六月廿六日

民政局長殿

内務部長

臺北縣廳ヘ通知案

明廿七日以降毎日正午號砲發ス旨市民ヘ

民ヘ於テ疑惑ノ念ヲ生ズル[illegible]

出張所ヘ通知方出張中[illegible]

年月日

圖2 正午號砲發射通告

1 本館典藏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48280260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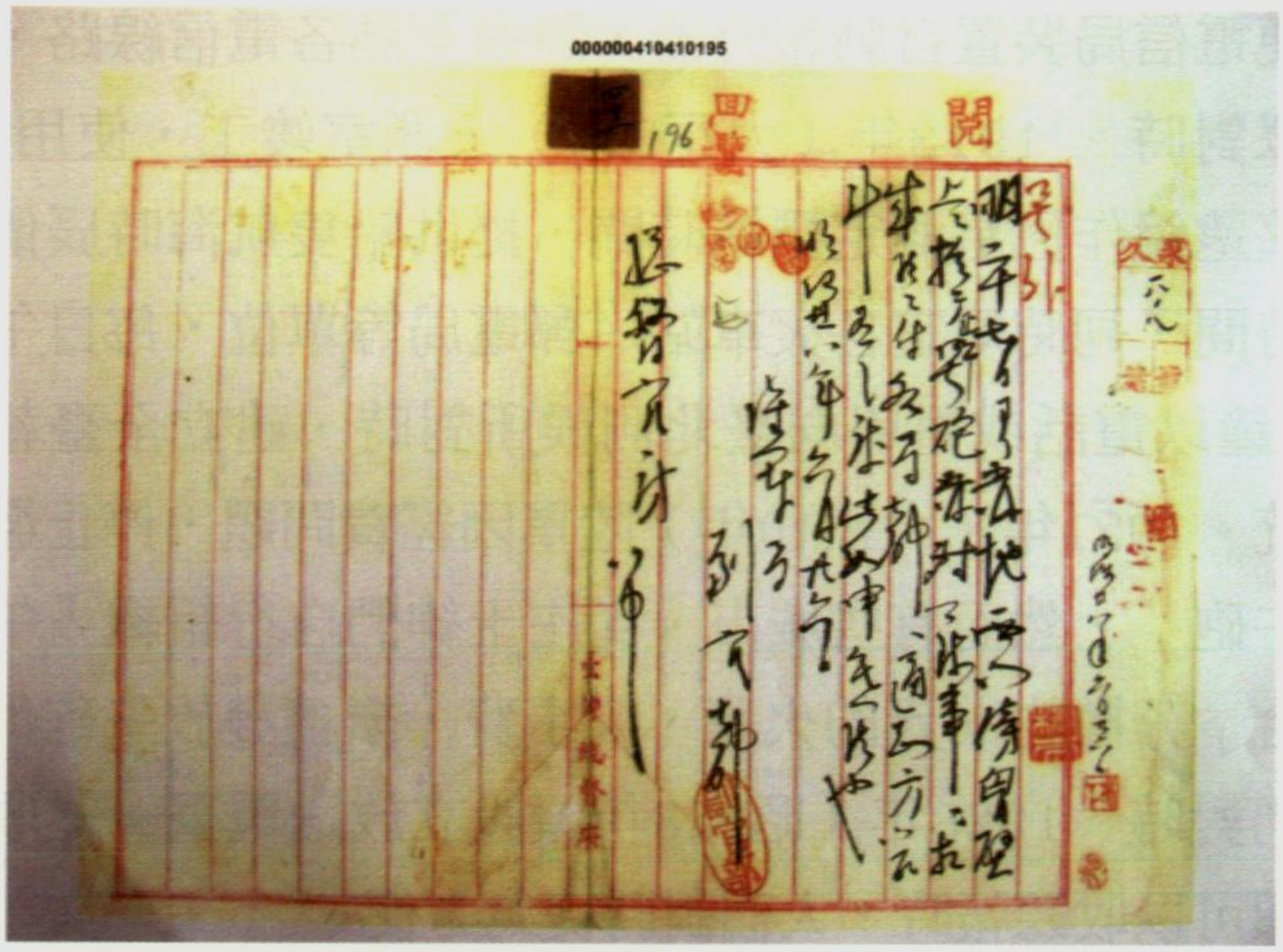


圖3 陸軍局正午號砲發射報告

圖4 有關號砲發射所需火藥等報拓務省審議

新的標準時間開始實施，為培養民眾準時、守時、惜時生活習慣，臺灣從1921年（大正10年）開始，將內地1920年所定的6月10日全國「時的紀念日」，全盤移來臺灣積極推廣，透過機關、學校、社會團體、寺廟、工廠等，以舉辦演講、遊行、音樂會、張貼海報、分發傳單、編曲教唱「時之歌」、正午12時寺廟教會鳴鐘鼓，工廠車船鳴氣笛水螺喇叭對時，五花八門種種方式加以宣導。

1937年（昭和12年）10月，臺灣在戰時體制下，因軍令系統之需要而將臺灣本島與內地同採中央標準時間。1945年（民國34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恢復東經120°標準時間，將臺澎劃為全國5個時區之中原時區，以中原標準時間稱之。[2]並依照內政部所訂頒全國各地標準時間推行辦法，規定全國各地標準時間之供給，由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與國防部測量局會同負責；報時事項，由內政部指託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負責辦理。各民營廣播電臺之報時，以中央廣播電臺所報時間為準。全國各地電信機關之時間，須與各該區標準時間校準，負責答覆民眾標準時間之詢問。各地方政府均備收音機，並特備時鐘一座，收得各該區標準時間

2 內政部訂定「全國各地標準時間推行辦法」，行政院於中華民國28年5月11日核准，34年11月26日修正。

後，須校準特備時鐘。未備收音機者，應由地方政府商洽當地電信機關，於每日一定時間依電信標準時間校準時鐘。各地方政府依標準鐘，並採用午砲或其他信號傳報時間讓民眾知道。[3]久而久之，現在標準時間之報時為「現在時間××點××分××秒」，而國際間則以臺灣或臺北標準時相稱，社會大眾也都習以為常了。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在臺灣行使100多年，傳統標準時間校正的作法，隨著鐘錶普及，精密準確，計時器內鍵於日常生活用品中如電視、手機、電腦、看板等，幾乎無所不在，而被淘汰了。傳統計時的時鐘，例如各地老車站正門上方的鐘塔、大廳、月臺上的子母鐘，雖然逐漸被電子鐘取而代之，但它們依然是人們對於車站的共同印像。即使速度超快的高鐵，在車站裡外都掛著用衛星校正的大圓鐘，宣示重視時間的鐵路傳統。

縱使當下網路最流行的時間詞是「秒殺」，但是傳統計時方式，在民眾生活裡如：命相、日課、宗教科儀等，依然存在。就連古時候的報更與更夫，在寺廟的作息或廟會活動裡還常見到，例如臺南西港慶安宮做醮科儀，迄今還保留著打更鼓報時。（圖5）

3　本館典藏臺灣省政府檔案539900360093。

圖5 臺南西港慶安宮更鼓

參考資料：

一、臺北市天文教育館網站

二、http://www28.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9685535&ext 查閱時間20091126。

三、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061614442 查閱時間20091203。

四、洪致文網誌〈臺灣標準時間〉。

（李西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組長）

埔里辛德勒名單：謝添發家族

文／圖 李展平

烏牛欄事件

埔里愛蘭台地係平埔族於道光3年，自臺中豐原、東勢岸裡大社之一的烏牛欄社，遷移至埔里，屬於巴宰社群；由大馬璘、阿里史、烏牛欄三社居住。日據時稱烏牛欄莊，光復後改為愛蘭，當地愛蘭教會為平埔族信仰中心，醒靈寺則為後來遷入漢人的信仰神。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透過收音機傳送埔里時，頓時人心惶惶，不少暫居埔里的外省公務員怕被毆打，亦躲藏起來，市街成混亂現象；地方士紳出面組織「雙九會」，成員約40人，公推施雲釵為會長，扮演埔里鎮時局對應與臨時警察角色，藉以維持治安。根據黃金島的回憶：27部隊是由「獨立治安隊」、「臺中一中隊」、「警察隊」、「自衛隊」、「臺中師範隊」、「臺中商專隊」、「埔里隊」、「建國工藝學生隊」

組成，獨立治安隊改為警備隊，成為27部隊營區安全主力軍。[1]以目前有關「27部隊」古瑞雲著『臺中的風雷』、黃信卿著『站在第一線』看，除部隊長、副官、參謀長、宣傳部長四職位，分別由鍾逸人、古瑞雲、黃信卿、蔡鐵城四人擔任外，唯一無爭議是：「烏牛欄之役」係由警備隊長黃金島率領，造成國軍相當重的傷亡。[2]

據黃金島自述：「二二八事件」中，烏牛欄戰役是我參與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正式軍事行動。國軍將近百人死亡，27部隊也有數位戰死…，他說：21師的登陸及27部隊向埔里撤退，對士氣打擊很大，加以27部隊是臨時湊合，面對國軍攻擊，軍心十分浮動。[3]由於兩軍對峙，埔里情勢格外險惡。3月12日下午自埔里國小，移駐前日本警局「武德殿」，這天晚上，埔里區長廖德聰為首的地方士紳，找謝雪紅等人談判，但為27部隊幹部嚴詞拒絕。事實上大部分埔里鎮民，已帶著重要家當，疏散到郊區、山區的親友處避難。筆者於口述黃金島先生，為何27部隊想轉戰埔里？

黃老表示：他們希望控制日月潭發電廠，進一步控

1 黃金島，《228戰士；黃金島的一生》，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00。

2 鍾逸人，《辛酸60年（下）》，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元月，頁475，由黃秀政評鍾著《辛酸60年》史料價值。

3 同注一，頁109－111。

制臺灣主要電力。除此，若反擊國軍失敗，部隊可進入霧社及中央山脈深山，與國軍展開長期游擊戰，是重要原因。

圖一　二二八烏牛欄事件吊橋（鄧相揚提供）

謝添發掩護外省同事始末

儘管事後黃金島等人告訴筆者：他們27部隊只是反貪腐反暴行，不會加暴無辜的外省仔。唯事實又是事實，許多無辜的外省民眾，不幸被反抗人士碰到，常被打得頭破血流，甚至被踹進水溝裡。世居愛蘭的謝秀能感慨說：古往今來許多抗暴示威者，總有許多崇高神聖的理由，號召群眾或昭告天下，但示威者進入街頭稍被鼓動，往往如脫韁野馬，形成脫序動作，並非領導人所能控制的。

基於上述歷史觀察，世居愛蘭百年古厝的謝添發，時任埔里菸酒配銷所主任，眼看埔里酒廠廠長李正籌等30多名福州（福建省）員工及家眷，無處可逃；且反抗人士到處搜尋外省仔蹤影，看到就打，管他是好人或壞人，完全沒有是非。謝添發眼看情況危急，即刻通報埔里酒廠廠長李正籌：「外頭市街已很混亂，尤其

外省人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想安排廠內福州鄉親，暫避風頭，躲進我古厝。」話才說完，李廠長低沉的說（很濃的福州腔）：我們逃難固然重要，但此時此刻外省人已變成原罪，會不會拖累你？李廠長謙卑的回應。

圖二　埔里的辛德勒謝添發生前照片

一向熱心助人的謝添發主任，第一次碰到族群械鬥，又是30多個福州同事及家眷，掩護他們，尤以距烏牛欄吊橋不到百公尺的事件地點，確有某種程度的困難和冒險。停頓、思考半晌之後，謝添發斷然的：事到如今，先救人要緊，可能的後遺症或麻煩，暫時拋一旁。趁著黑夜，他領著一群男女老幼30多人，直奔埔里愛蘭臺地，躲在距今已百年歷史的「寶樹堂」祖厝。據當時已16歲的謝秀成回憶：「當時大伯（謝添發）及家父添丁共同指導掩護工作；開始躲在眠床底下，早年眠床皆架高，床下留有很大空間。後來27部隊與國軍21師決戰烏牛欄吊橋，」而我們祖厝首當其衝，連夜又移往桃米坑竹林內…」現年80歲的謝秀成（民國21年12月生），

擔任通報及搬運米食工作，身手矯健。他提及烏牛欄戰役時，反抗者如埔里童江立醫生，經常坐吉普車到家裡來訪視，詢問：有無藏匿外省仔？有無看到外省仔？我們皆表示：不知影。攏無看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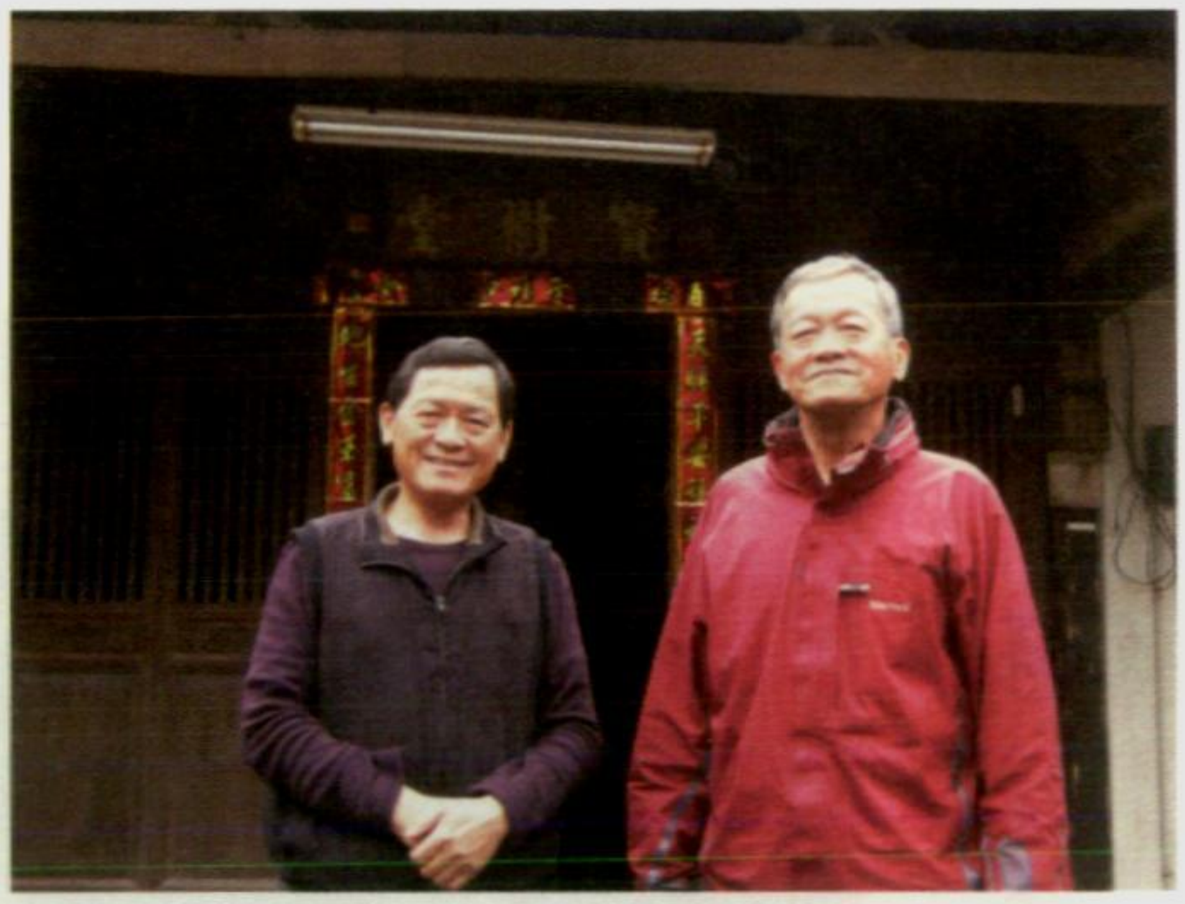
關於童江立的身份，在烏牛欄事件角色，據黃金島的敘述：「國軍21師的進軍，由埔里童江立醫生做嚮導。童江立原來對臺灣人反抗軍非常支持，一看時機不對，就投入國民黨懷抱，甘為走狗、馬前卒…。二二八事件後不久，他在埔里遭民眾冷眼及排斥。住不下去，後來搬到臺中市西屯區。這些事是我做了24年黑牢，回臺中聽人提起的。」[4]根據筆者調查：童醫師係日本東京醫專畢業，曾任南投縣議員，任期為2、3、4屆，是埔里地區名醫。其政治觀點的轉變，或投身國民黨政府，有其時代性考量，筆者以為那是個人在亂世中，個體的生命抉擇，沒有特別值得批判之罪；何況童醫師先後代表第五選區，競選2、3、4屆縣議員，也獲得選民支持當選，顯示一介醫師除了醫病外，還關心社會福利，實現政治承諾，對政治持極大的使命感。如因政治立場的異同，被評為走狗，當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吧？

4 同注一，頁109－111。

圖三 民國百年二二八紀念館揭幕，黃金島應邀與馬總統合照。前排左三為黃金島先生。（照片由其提供）

祈求列祖列宗保佑

世居埔里愛蘭台地，參與掩護行動的謝秀成說：「由於祖先自二林搬來，與前副總統謝東閔同公族，目前在田中的謝氏祠堂裡還有祖父謝鹿，及謝副總統捐款名錄。祖父謝鹿於大正5年，（民國5年）於愛蘭台地建三合院，取名為「寶樹堂」，作為忠孝傳家寶地……據史料記載：寶樹堂為天下謝氏共同使用堂號，相傳東晉是謝族鼎盛時期，朝廷做官很多，顯赫朝堂。天猶未亮，官員就打著燈籠上早朝，到了金鑾殿，將燈籠掛在門外樹上。某日皇帝見樹上掛滿寫著「謝」字的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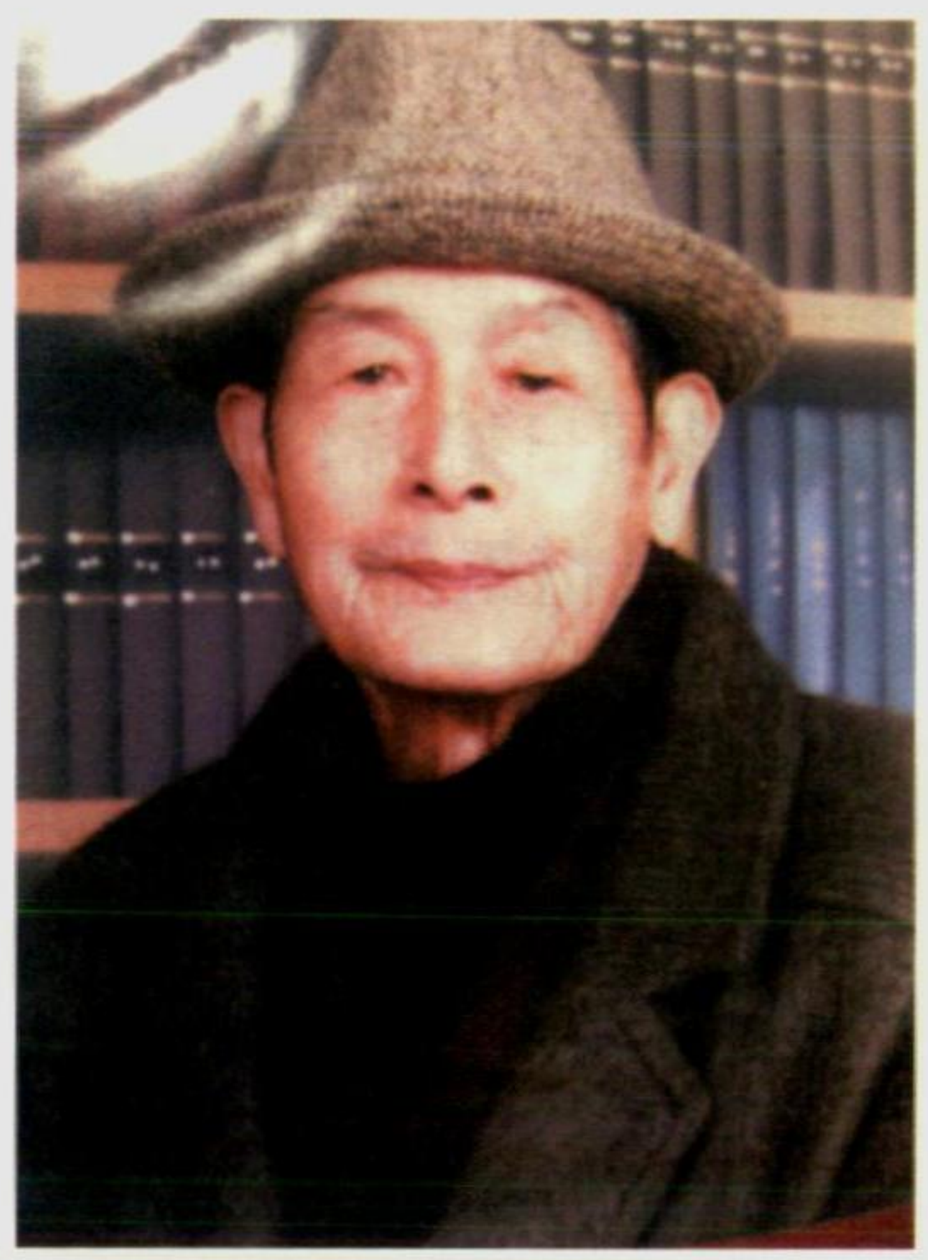


圖四 掩護外省同事的謝秀成右一，與其弟謝德福合影於寶樹堂祖厝前。

籠，燦爛奪目，便稱道：真寶樹也。以後謝氏就以「寶樹堂」為堂號，史家言：不管該堂源於何種典故，反正離不開以謝安為代表的東晉朝廷。目前猶矗立樟樹、龍眼、南洋杉老樹，藉以強化「寶樹堂」的歷史典故，及文化淵源。

一般閩南公廳是安置一個家族祖先祭祀所在，農業時代，出嫁的女兒及未嫁的姑婆，皆不能入祀娘家公廳，是男尊女卑最明顯的例子。「公廳」祖牌，是祖先神靈的皈依，也是每位族人生命終極的停靠站。「寶樹堂」大家長謝添發每至夜晚，常在幽幽的煤油燈廳堂裡，取下老花眼鏡，深深的叩首祖先，口中喃喃：「祖公，您要顯靈啊，子弟添發正掩護30個無辜的外省人；他們自大陸退守臺灣，一路流浪，無半無項，也需傳宗接代，您們著保庇這些人渡過難關哦…不要成半路屍啊。」說著，說著，留下兩行清淚，自己用衣袖擦拭。由於謝氏秉持東晉謝安忠孝傳家，公廳也成為家族永續的家業；不像許多家族公廳消失，親族感情迅速崩解、

分散，令人感傷。故謝家「寶樹堂」歷經百年風雨歲月，仍能小心呵護，遍植老樹，作為凝聚家族親密情感的符碼；公廳香火也不允許被「分割」出走，誰言：「公媽甭分割，感情卡袂散」，證之於謝添發家族，如今共有祖祠，一團和氣，反映百年風水的清明與慈悲。



圖五　烏牛欄事件參與胞兄謝添發保護３０多名福州人的謝添丁照片。

當烏牛欄戰役27部隊與國軍21師吊橋對峙，是海拔500公尺的河階台地，居高臨下，有陡起的險要崖壁；謝家古厝距戰事僅百公尺之遙，時局益發緊張、險惡；此時主其事者謝添發帶著胞弟謝添丁、侄兒謝秀成，一起跪在祖厝前，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外省同事、家眷平安，保佑他們能安度危急，叩謝3回後，始退出祠堂。謝家婦女每天以大口鼎煮飯，米是一斗斗的倒〈不惜成本〉，據謝秀成表示：我們祖家田產不少，算是愛蘭小地主啦，吃米絕對沒問題。至於菜色比較費事，除了生鮮蔬菜，菜乾、蘿蔔乾、筍乾皆上菜。偶而三層肉焢筍乾、鹹鰱魚、魚脯仔補充；因為當時鄉下生活清

苦，有飯可吃，有菜可配，算是很幸福了。當家人把幾桶飯送進來，碗公菜裝妥，大夥兒便蹲在地上一起用餐…李正籌廠長帶領鄉親，面帶懼色，吃飯的聲音靜悄悄，形同日據時代躲空襲。席間，李廠長一直低頭道謝，表示拖累你們了，我們會終生感激。謝添發回答：不用太客氣，你們福州同事家眷住這裡，能得到暫時的安全，何況外面很亂，外省仔人人喊打，我們同事情誼，互相照顧，也是理所當然。只見眾多家屬流著淚，吞嚥著飯，他們因謝家的救人行動，盡心盡力，情動於衷，幾乎哽咽。

吹口哨吃飯

3月15日晚，烏牛欄吊橋不斷有槍聲、爆炸聲傳出，似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謝家人到吊橋附近打聽戰情，免得因消息延誤而危及生命。當他們獲知：兩軍將有激戰，便徹夜面告李廠長：外面很緊急，我們今晚轉移到桃米坑竹林躲藏。由於謝家在附近擁有廣大林地，加上謝添發在地方上頗受敬重，半夜集結，穿過竹林、溪谷，沿途遇有盤問，皆能善意放行，一夥人遁入竹林深處，暫居切青筍的工寮。據謝秀成回憶：彼時工寮荒野，蛇類如青竹絲、雨傘節、龜殼花頗多，尤其黑斑蚊環繞，躲藏的日子實不好過。那群福州幫同事，大白天躲在竹林聽竹雞，吱咯怪吱咯怪鳴叫，在溪邊抓螃蟹加

菜，暫忘逃難苦悶，只是太多蚊蟲讓皮膚受罪，經常頭、手、腳，一疤疤的，防不勝防。藏身密林很苦，但供應飯菜的謝家人也不輕鬆，謝秀成告訴筆者：當時反抗軍查緝很嚴，到處設柵欄盤問，尤其謝家幾乎是他們必搜之地，那個童江立醫師每次開吉普車來，按3個喇叭，隨即調頭而去。由於他跟謝添發有私交，謝氏開西藥房，獲得獨門藥方，自製中藥水，只要感冒、喉嚨發炎，一噴即效，此事在埔里街上有口皆碑；因為藥商與醫生的關係，童醫師顯然避重就輕，或根本虛應故事，讓老朋友實現「救人善舉」。

圖六　當年參與保護外省人謝秀珍（謝添發之子）之妻，於祖厝留影。

謝氏子弟既然扛下掩護外省同事的任務，每天自愛蘭台地背著斗幹（語自泰雅族的背籃），裝上魚、米、醬、醋、鹽、福菜、鹹菜、菜脯、鹹魚、菜頭、醬筍等雜貨，尋山徑的舊路，沿途披荊斬棘，攀越層層桂竹林，才到謝家林地。據謝秀成胞弟謝德福表示：那時家裏年輕力壯的，有堂兄謝秀珍、大哥秀成及家父謝添丁，負責背負重物，攀登陡峭的竹林，其體力與危險性

都是極大的挑戰，但他們把救人的擔子挑起來。這種躲在竹林的日子，前後約10天，讓補給工作倍覺艱辛。倒是今年80歲的謝秀成說：「怕那些福州同事沒胃口，大伯添發要我們做糕餅、莉殼仔糕、麻薯等零食點心，怎知…那些糕餅經過碰撞、擠壓，到桃米坑，已變成粉末狀，不成形，真歹勢…」唯他們用碗調水當甜點吃，也很開心。

散落在桃米坑竹林內，平時一個人影也難覓，等開飯時間一到，吹口哨呼叫，一長一短，表示集合開飯，只見四方食客瞬間跑出來，很有默契；躲藏約10天俟風聲稍平靜始返回愛蘭台地。事件過後，他們輾轉調到林務單位、省政府或外地酒廠服務，天涯星散；原埔里酒廠長李正籌先生後來調往嘉義「楠濃林務處長」退休，經常帶領同事馳赴愛蘭台地寶樹堂拜會謝家；這個故事掩藏64年，始於今年二二八前夕，由聯合報埔里記者紀文禮揭發，筆者做深入的追蹤發現：埔里的辛德勒冒著兇險，雖千萬人吾往矣！令人肅然起敬。

（李展平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纂）

臺灣鸞門出版異數：《海嶠鸞音》

文／圖 林文龍

臺灣的扶鸞著書，以信奉恩主體系的儒宗神教鸞堂分布最廣，鸞書著作亦最多。他如五福大帝以及瑤池金母信仰體系，亦各有扶鸞著書活動，惟數量較少。五福大帝系統的臺南西來庵，因余清芳抗日事件而著稱，為清代福州營兵的共同信仰，著有《警心篇》一書，即係「奉旨飛鸞闡教督造」而來。金母系統者宮堂稍多，如臺北大稻埕三教杏壇有承「瑤池老母」懿旨而著的《海嶠鸞音》一書，即是一例，書分「28集」，凡345篇，合訂1冊。

《海嶠鸞音》的扶鸞者三教杏壇，顧名思義是以三教合一崇祀聖神仙佛的壇廟，以扶鸞著書為主要廟務，據該書版權頁記載，三教杏壇為臺灣省道教會團體會員之一，不過由「杏壇」二字，可知是個比較偏重儒家思想，為無鸞堂之名的鸞堂。正式印製約定稿於「天運甲辰」，即1964年（民國53年），至1966年（民國55

年）印製完成，由前臺北市長黃啟瑞領導的「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正式發行。

本書雖傾向於儒，卻與「儒宗神教」鸞堂不相關連，是其特色之一。其印製發行，前有抗日志士張邦傑，後有市長黃啟瑞、礦業鉅子李建和等重量級人物參與，加上與正宗書畫壇合作，穿插銅版紙彩色頁的仙佛降筆書畫，可能開鸞書彩色印刷之破天荒。而負責全書校對的「杜爾瞻」，則是日治時期北臺名儒杜仰山，杜氏曾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委員。有了這些組合，勸募極為順利，辜振甫也有鉅額捐款。此次捐款共得新臺幣9萬元，印製精美鸞書4,000冊，在物資缺乏的年代，不啻是大手筆，因此《海嶠鸞音》無論紙張、印刷、裝幀都臻上乘。

圖1 封面與書套

通常鸞書都會在各篇鸞文前後，附記扶鸞時間，方便查考，但《海嶠鸞音》並無此一記錄，且乏較為詳實的鸞務介紹，是為美中不足。不僅三教杏壇的創立無所著墨，就連著書到印刷歷程，也只能旁敲側擊，始能略窺始末。書前有「南宮孚聖」、「南宮孚佑帝君」兩序，前者未紀年月，後者則為「天運甲辰季冬」，即1964年農曆12月。文中說：「經2年而著就，得一氣以呵成」，稍透露著書時程，據降序時間逆推，最遲在1962年的年底，三教杏壇已經開始進行扶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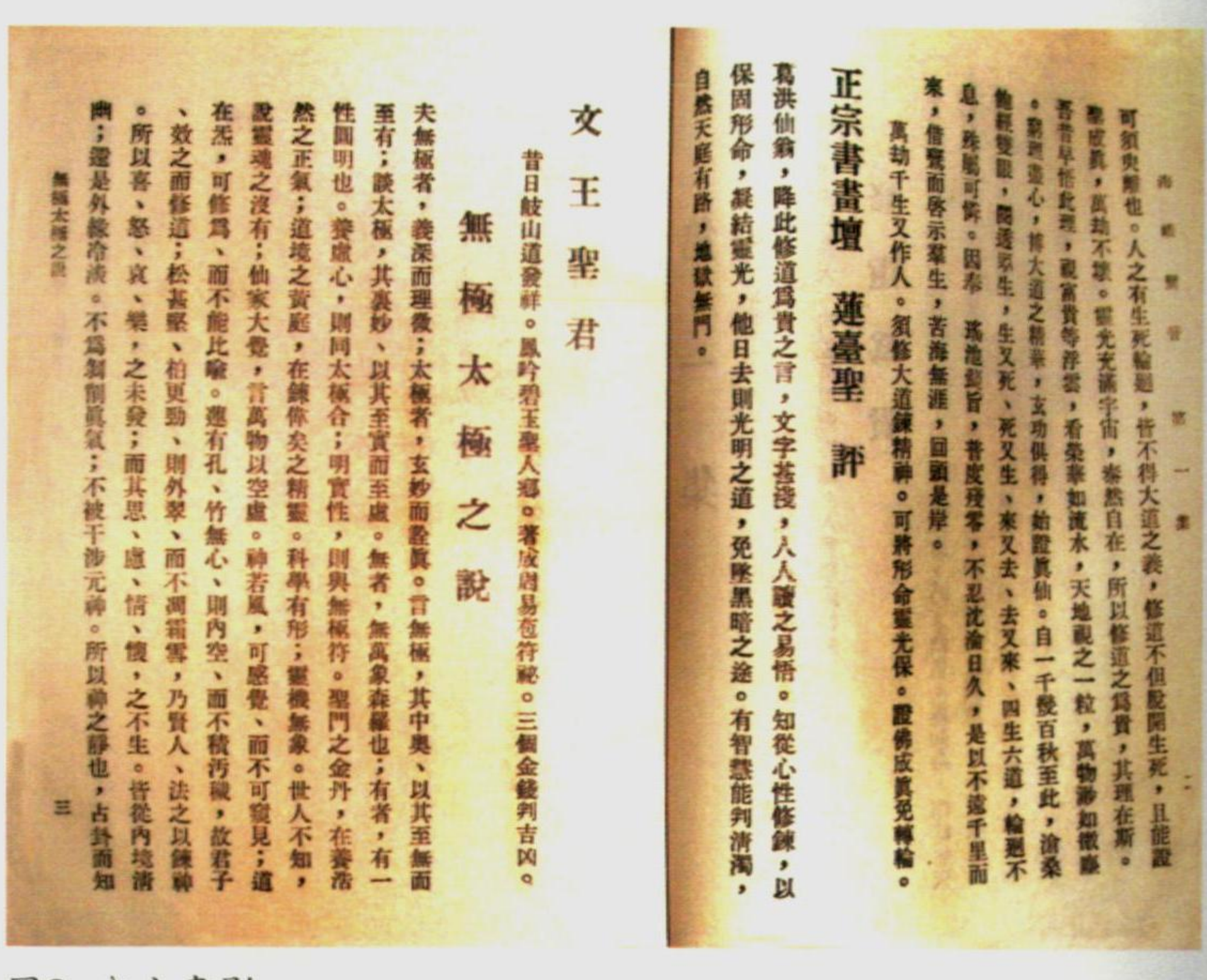
全部鸞文記錄，依據凡例所載，最初是以手寫油印，分給信眾。之後，再連載報紙型月刊。此一階段的關鍵人物，據贈書所附印刷信函表示：「是書前由愛國志士張邦傑先生之倡首以謄寫版，繼刊於報紙，免費贈送各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張邦傑，高雄旗後人，1897年生，早稻田大學畢業，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後在福建成立「臺灣革命黨」，為國民政府少將，與李友邦等發起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1941年1月，成立「臺灣民眾協會」。1945年，為接收臺灣核心成員。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參議等，卒於1964年。張邦傑為近代臺灣知名政治人物，可能少有人知道他也是個熱心勸善的鸞門人物。

張邦傑過世後，「因志士西歸而致中斷」，三教杏壇同人「因恐歲月轉轂，易於散漫」，乃由社會地方

士紳發起「善書海嶠鸞音頒贈委員會」，計畫編印單行本，以廣流傳。委員會請剛卸任的臺北市長黃啟瑞，擔任主任委員，副主委則有李建和、許火車、黃朝君，常務委員為詹聰義、許尚文、李丙心、駱水源、陳許鳳吟等。黃啟瑞為臺北市第8屆、10屆市長，1964年6月卸任。李建和，臺北瑞芳人，李建興之弟。曾任臺灣省議員，為臺灣煤礦鉅子。許火車為鸞門活躍人士，曾任財團法人臺北智仁堂第一任負責人。詹聰義字青涯，號自虔，法號慧明居士，臺北人。東京外國語學校、早稻田大學法學系畢業，國際文化學院及瑞士聯邦州立伯恩大學法學博士。曾任軍法官教官、教授等。李丙心，臺北平溪人，成淵學校法律經濟專科畢業，曾任臺北市議員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第3屆議員、第1屆省議員。駱水源，臺北市人。臺灣商工學校商科畢業，歷任臺灣新報社、民報社記者。臺北市參議員、第1屆臺北市議員。

《海嶠鸞音》本由三教杏壇扶鸞著書，但在印製過程，卻與扶鸞書畫的正宗書畫壇結合，而在書中留下精采的仙佛書畫。兩壇（三教杏壇、正宗書畫壇）如何結緣，不得而知，宗旨一致及成員重疊可能是重要原因。正宗書畫壇接手之後，曾做了若干「修補」，凡例載：「《海嶠鸞音》仰蒙至聖先天老祖之特命，蓮臺聖、岳聖、濟佛三聖佛，駕臨正宗書畫壇，揮毫恩賜聖藻，闡化道妙，增添玄機，留存下土，以助深味大道之綜合寶

冊也。」凡例附註又說：「然為道謹慎，數次請鸞，荷蒙蓮臺聖臨壇，奉命修補全卷，以完就而付印者也。是故既頒之謄寫及新聞版等，若有部分差異，應遵聖命，以本冊為準正。……至本書之標點，悉由敝壇為之，謹特此補充說明焉。」修改字句以及全部標點，都是經過正宗書畫壇斟酌，尤其前者仍是請鸞臨壇修訂。



海嶠鸞音　第一集

可須臾離也。人之有生死輪廻，皆不得大道之義，修道不但脫開生死，且能證聖成真，萬劫不壞。靈光充滿宇宙，泰然自在，所以修道之爲貴，其理在斯。吾等早悟此理，視富貴等浮雲，看榮華如流水，天地視之一粒，萬物渺如微塵。勤修道心，修大道之精華，玄功俱得，始證眞仙。自一千發百秋至此，滄桑幾經變眼，閱透衆生，生又死、死又生、來又去、去又來、四生六道，輪廻不息，殊駭可怪。因春　瑪地藏旨，普度殘零，不忍沈淪日久，是以不遠千里而來，借鸞而啓示羣生，苦海無涯，回頭是岸。

萬劫千生又作人。須修大道鍊精神。可將形命靈光保。證佛成眞免轉輪。

正宗書畫壇　蓮臺聖　評

爲洪仙翁，降此修道爲貴之言，文字淺淺，人人讀之易悟。知從心性修鍊，以保固形命，凝結靈光，他日去則光明之道，免墜黑暗之途。有智慧能判清濁，自然天庭有路，地獄無門。

文　王　聖　君

昔日岐山道發祥。風吟碧玉聖人鄉。著成周易包符祕。三個金錢判吉凶。

無　極　太　極　之　說

夫無極者，幾深而理微；太極者，玄妙而登眞。言無極，其中奧、以其至無而至有；談太極，其裏妙、以其至實而至虛。無者，無萬象森羅也；有者，有一性圓明也。養虛心，則同太極合；明實性，則與無極符。聖門之金丹，在養浩然之正氣；道境之黃庭，在鍊你矣之精靈。科學有形；靈機無象。世人不知，殷靈魂之沒有；仙家大覺，言萬物以空虛。神若風，可感覺、而不可窺見；道在炁，可修爲、而不能比喻。邊有孔、竹無心、則內空、而不積汚穢，故君子、效之而修道；松甚堅、柏更勁、則外翠、而不凋霜雪，乃賢人、法之以鍊神。所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其思、慮、情、懷，之不生。皆從內境清幽；還是外緣冷淡。不爲制削眞氣；不被干涉元神。所以神之靜也，占卦而知

無極太極之說　三

圖2　內文書影

正宗書畫壇，顧名思義，以恭請仙佛臨壇揮毫書畫為主要鸞務，與一般鸞堂以詩文降筆不同。書由該壇出版，也因而留下數十幅仙佛降筆書畫，其中彩色銅版紙印刷者15頁，三教杏壇詩文、正宗書畫壇書畫合為

一書，圖文並茂，就臺灣鸞門出版史而言，雖未必是絕後，至少稱得上是空前。《海嶠鸞音》出版至今，將近50年，正宗書畫壇後於1972年6月奉准立案，並改名「正宗書畫社」，如今盛名遠播，而三教杏壇似乎已不再活動，《海嶠鸞音》的流傳，薈萃書畫詩文，堪稱臺灣鸞門異數，也見證兩壇合作歷史。

圖3 扶鸞揮毫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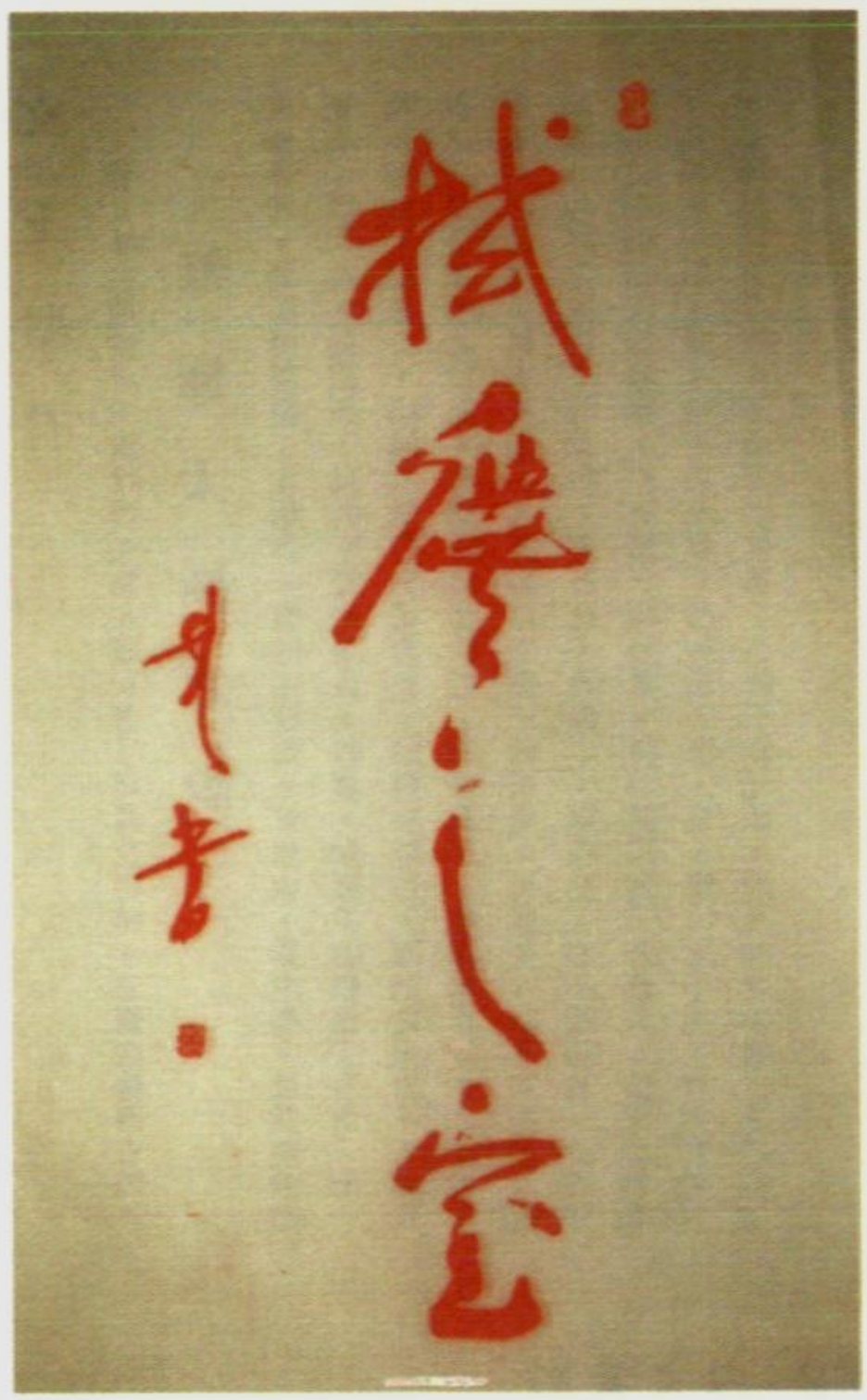


圖4 扶鸞揮毫書法

（林文龍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垃圾？瑰寶？搶救日治時期警察民政檔案

文/圖 陳遵旭

歷史，究竟是什麼？是存在的價值？是反省的意義，亦或是流逝於時間中的廢棄物？不同的角色，產生不同的見解，不變的是，歷史確實存在於時間當中的這個事實。

筆者是一個對地方文史懷抱著興趣與理想的新手文史工作者，投入於雲林地區的文史採集與地方營造時間雖然不長，但點點滴滴的過程，尤其是在雲林縣斗六市的溝埧社區，讓筆者對於臺灣文史工作環境，激盪出從未想過的感觸。

溝埧社區，位於斗六市區的南方，是一個僅有三條街道範圍的小小社區，雖然小，但無論是人、建築、產業、甚至社區本身，都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背景，追朔溝埧社區的歷史沿革，自清朝時期就已經見於地方志書上，從地名上來看，可以概分為清朝時期的雲林縣溝仔

街、溝仔莊；日治時期（嘉義廳）在之溝仔埧莊、溝仔埧；日治時期（臺南州）之溝子埧，以及光復以後（民國70年）統稱之溝埧，不同的名字，卻營造出相同的溝埧人文歷史記憶，而其中濃厚的文史特色，在一連串的社區營造過程中，逐漸展現出其價值，卻也浮現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存廢矛盾。

圖1　日治時期建造現為溝埧社區活動中心的歷史建築

筆者與溝埧社區接觸，緣於雲林縣社區營造計畫，而社區營造的其中一項工作，是改造社區閒置建築，成立社區生活館，與社區理事長及幹部討論後，決定以社區內從日治時期就建造，目前為社區活動中心的歷史建築，作為社區生活館的位址。

這棟歷經滄桑的建築物，分為前後兩個部份，後方和室部分初期作為保甲辦公室之用，前方空間則為社區集會與活動場所，在三樂路開通之後，後方辦公室的位置，門牌設為三樂路 1 號，

圖2　社區活動中心旁溝埧派出所借駐

而隨著時間前進，民國60幾年此棟建築改作為斗六托兒所之用，打造了許多溝埧居民們的童年記憶，直到民國80幾年，才卸下托兒所的重任，但也從此閒置，時光飛逝，後來隔壁的溝埧社區活動中心建立，不久後溝埧派出所借駐活動中心，三樂路 1 號的位置，也從閒置變為堆放文件及物品的倉庫，從此逐漸在灰塵中，黯淡其歷史的光芒。

圖3 社區活動中心後方原保甲辦公室之門牌

故事就發生在淪為倉庫的這棟建築當中，當確定以活動中心為社區生活館改造位址後，首先面對到的就是清理成堆的雜物，一進入後方和室的空間，放眼望去，全是派出所與社區長年累月所堆起的雜物，捲起袖子，一件一件的清理時，赫然發現在牆壁櫥櫃內，那一大堆束之高閣，破爛潮濕的紙張文件，是日治時期留存下來的派出所檔案，筆者與志工將之搬出堆放的壁櫥，暫時以黑色塑膠袋收裝，其數量多達10多包，小心翼翼的翻開因蟲蛀、

圖4 淪為倉庫堆滿社區及派出所雜物之保甲辦公室

潮濕、綑綁而殘破不堪的檔案，只見端正字跡躍然於目，一筆一筆皆是小楷毛筆所寫，概略翻閱，包含明治年間以降各時期之文件，內容多為當時各式戶籍調查之資料，雖當時並無特殊歷史事件需此批資料佐証，然筆者長年對於文史的接觸經驗，深信此批文件仍有其歷史意義與價值。

圖5 所有廢棄物清出後可看出原保甲辦公室之和室原貌

因筆者為替社區進行社造工作，作為一個協助者的角色，在發現此批歷史文件後，隨即與社區理事長聯繫，討論此批文件的處理方式，從筆者的觀點認為，此批歷史檔案極具價值與意義，然因環境保存惡劣，已逐漸毀損，應隨即將檔案送交可做修復與保存處理之單位，然理事長認為該批文件之所有權人為溝埧派出所，應交由派出所處理，且內容為警察檔案公文，為保機密應銷毀，派出所也無心處理該批文件，認為這些

圖6 在壁櫥中赫然發現成堆堆放的日治時期警察檔案

都已是廢紙垃圾，交由清潔隊銷毀處理即可，在爭論過後，筆者畢竟不是所有權人，僅能妥協，但心中仍不捨此批珍貴文件落得銷毀下場，隨在垃圾車搬載清理同時，搶救下最後一包塑膠袋，而這一包，也成為了雲林溝埧地區僅存的地方民政史料。

圖7　因保存環境惡劣而殘破不堪的日治時期警察文件

搶救下此批文件，接著就是煩惱何處可以修復與保存此批瑰寶，當下，筆者馬上聯想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因筆者在此服役時，深知文獻館為臺灣重要保存史料之寶地，且館內具有修復、驅蟲、保存等能力，相信能給此批資料做最好的處理，因此在與館方聯繫後，趕緊前往臺灣文獻館，由整理組簡組長與陳研究員接手，將此批文件交由館內處理。

一打開塑膠袋，簡組長、陳研究員與整理組內員工欣喜之餘，更多的是不捨的心情，因看著這批資料一件件的潮濕、破損、甚至佈滿蟲卵，和筆者感嘆聊到，當初館方曾函文各地警局派出所，希望能夠蒐集其存留之警察相關文件資料，結果多回函並無保存，今日見到此

批文件，竟然是堆放在壁櫥當中，任其破損毀壞，甚至竟要將其當作垃圾丟棄，臺灣對於歷史文件的保存，不受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

此次事件，讓筆者再次看見臺灣歷史文化的弱勢，在少數珍惜歷史人眼中的瑰寶，在多數人眼中只是堆垃圾，更可惜的，是重視這些瑰寶的人，往往無權處理這些充滿歷史價值的資料，此次若非有社區營造工作的機會，這些文件將永遠在角落當成廢棄物處理，誰能知道，臺灣各地又有多少這樣的歷史資料被當成垃圾般堆放處理，甚至因此消失，而歷史的拼圖當中，也因此缺少一塊，所思至此，令人不勝唏噓。

圖8 整理搬出後多達10多包的日治時期警察檔案

（陳遵旭　　雲林縣大步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臺灣文獻 別冊 36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發　行　人／林金田

編輯委員／吳學明　林美容　林呈蓉　林金田
林文龍　陳國棟　陳文添　黃富三
黃秀政　溫振華　歐素瑛　劉澤民
戴寶村（按姓氏筆劃排列）

總　編　輯／歐素瑛

主　　編／李西勳

編　　輯／蕭呈章　李榮聰

美術設計／蕭淑薇

封面題字／林美蘭

出　版　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540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4號

電　　話／049－2316881－403或407(分機)

傳　　真／049－2329649

郵撥帳號／21271761

戶　　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shiao@mail.th.gov.tw
ljtz@mail.th.gov.tw

印　刷　者／財政部印刷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0年3月31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　非經同意，　請勿轉載

林爾康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附贈，
若單獨購買，每冊定價40元整